

第五

本期要目

印尼政局的剖析.....馬樹禮

與鮑爾斯晤談.....陶鵬飛

匪俄爭執的幕前幕後.....懷遠

亞洲共黨與匪俄衝突.....張棟材

菲律賓國會的政治風暴.....吳春熙

緬甸新經濟政策的背景與特質.....陳德規

匪區耕地問題.....劉岫青

日美關係的新發展.....朱少先

蘇俄工業及建設管理制度的演變.....呂律

蘇俄各加盟共和國政府改組分析.....關素質

第二卷 第九期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問題與研究

次 目

印尼政局的剖析	馬樹禮	(1)
與鮑爾斯晤談記	陶鵬飛	(7)
匪俄爭執的幕前幕後	懷遠	(11)
亞洲共黨與匪俄衝突	陳德規	(28)
緬甸新經濟政策的背景與特質	張棟材	(17)
匪區耕地問題	吳春熙	(22)
日英關係的新發展	劉岫青	(32)
蘇俄工業及建設管理制度的演變	朱少先	(35)
蘇俄各加盟共和國政府改組分析	關素質	(44)
略論共匪的商業經營	尹慶耀	(50)
亞洲的人口與勞動力研究	律	(38)
非洲經濟近況的研究	柯木興	(55)
轉變中的印度（上）	張伯淵	(64)
西德未來繼任總理歐爾哈特	尼赫魯著 黎啟榮譯	(67)
美國亞洲學會年會記	宋鳳恩	(70)
動態述評	史元慶	(73)
○國際：①俄拒付聯合國費用。②聯合國祕書處兩副祕書長逝世。③北約組織發表公報。④非洲卅國元首簽訂憲章。⑤科威特准入聯合國。⑥海地與多明尼加之爭執。⑦廈波完成太空之旅。⑧日美召開科學會議。⑨日澳召開經委會議。	(79)	
○蘇俄：①俄工業與建築業之缺點。②本年首季工業生產概況。③俄古加強勾結。④經濟互助委會動向。		
○共匪：①劉匪少奇續至東越活動。②匪黨新共發表聯合聲明。③僞文聯會三屆全委會議。		
④棉田稻田蟲害蔓延。		

印尼政局的剖析

印尼已於五月一日正式接管了西伊里安（新畿內亞西部），實現蘇卡諾的領土慾望，由西端的沙橫（Sabang），以至東端的墨勞基（Merauke），增加了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四平方公里的土地。蘇卡諾於志得意滿之餘，在外長蘇班德里奧（Subandrio）主持接管儀式組成西伊里安省府之後，乘坐了由蘇俄巡洋艦改裝而成的白色遊艇，一路興高彩烈，經過摩鹿加羣島的安汶（Amboin），於五月四日抵西伊里安行政中心的柯達塔魯（Kota Baru即前Hollandia）。

於是

可是，印尼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並不因為接管了西伊里安而稍見和緩。相反的却更趨嚴重。蘇卡諾原本計劃，於五月一日接管西伊里安的同時，還有兩件大事：一為廢止全國的「緊急狀態」法令，終止由中央到地方的軍事管制；一為改組內閣，實現其把民族、回教、與共黨三大力量結合一體的所謂「納沙公」（Nasakom）的理想，容納印尼共產黨入閣。現在，「緊急法令」雖然如期廢止了，但是爪哇各地跟着就發生了大規模的襲擊華人的騷亂，騷亂蔓延到蘇島的棉蘭，更轉變了方向，正式以地方政府為襲擊的對象。同時，雖然蘇卡諾已由其一手任命組成的人民協商會議決為印尼的終身總統，但是內閣的改組，則不見其再行提出，而全國的經濟，由於華人商業的停頓，則更陷於麻痺狀態。就在這樣

民不聊生舉國混亂的情況之下，終身總統蘇卡諾博士，突然率領着一羣大員，出國渡假去了。印尼！這個國家、政府、人民、與「領袖」，畢竟是一使人難解的謎。本文的目的，只在將印尼之龐雜的政治組織、紊亂的經濟狀態、狡詐的人事關係，與面臨的嚴重考驗，作一簡要說明，以供研究印尼問題的參考。

壹 龐雜無比的內閣組織

說到印尼的內閣組織，奇特與龐雜，在舉世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特先作扼要的介紹，以便瞭解所謂「工作內閣」的陣容。蘇卡諾為實行他所創制的「領導民主」，以遂其獨裁的願望，於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宣佈恢復一九五四年憲法，解散「制憲會議」，成立「工作內閣」，自兼內閣總理，並先後由其自己任命，成為最高立法機構（原係臨時國會，由一九五五年民選國會議員改任臨時國會議員，後因否決了一九六一年國家預算案，由蘇卡諾下令解散，自行任命議員，命名互助合作國會）；（三）臨時最高評議院，為最高顧問機構；（四）全國計劃委員會，為最高設計機構。

蘇卡諾的工作內閣，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又作一度改組，形式上陣容上都有更動。改組以前的工作內閣，在蘇卡諾自兼總理之下，以財政、國防治安、外交、生產、建設、福利、內政、分配和社會文化九個部長組織核心內閣，負責政策的取決，並由財政部長

尤安達（Djuanda）兼首席部長，後又增加兩名副首席部長，以分配部長雷孟那（Leimena）任第一副首席部長，外交部長蘇班德里奧爲第二副首席部長。另設副部長二十四人，分別執掌各部部務，爲執行官員。這二十四個副部長，有四個是直接向內閣總理負責，

衡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副主席及互助合作國會副議長。○參加內閣會議者，爲內閣總理（總統兼），首席部長、副首席部長、各部部長。但部長衡臨時人民協商會議副主席及互助合作國會副議長，均不得參加內閣會議。

其餘則分別隸屬於核心內閣的各部長之下，如：○生產部長轄有農業部、公共工程部、動力部及勞工部；○國防治安部部長轄有國防部、警察部、司法部、又退伍軍人事務部；○建設部部長轄有基本工業與礦務部、土地部、墾殖合作與農村建設部；○分配部部長有海上交通部、陸上交通部、航空交通部及商業部；○福利部部長轄有社會部、衛生部及宗教部，各部均由副部長主持部務。此外尚有當然的國務部長，即不管部閣員，其構成份子為陸海空三軍參謀長、最高檢察長、最高評議院副議長和全國計劃委員會主席。

閣會議。會後二年內開的八屆且，每屆所審各部數不等。首諾部長

改組以後的工作內閣，對人民協商會議副主席，互助合作國會副議長、最高法院院長、總檢察長、警察總監等都給予部長銜，致內閣人數增至五十人以上，並在組織上作如下的變動：

(甲) 部的變動：①增設民族研究部及體育部；②將農業與土地兩部合併為農業土地一部；③將財政部分為國家收支監督部、國家預算事務部與中央銀行事務部三部；④將墾殖合作與農村建設部分為合作事務部、移民墾殖部與農村社會建設部三部。另並增若干聯絡部。

(乙) 部的分組：內閣之下，分爲外交、內政、國防治安、生產、分配、財政、福利和特別組等八個組。內閣各部，均分別隸屬於各組。

(丙)增設副首席部長：○內閣仍由總統兼任總理，尤安達任首席部長，另設副首席部長十二人。○副首席部長中八人分別為外交、內政、國防治安、生產、分配、財政、福利和特別組等八組的領導人。○副首席部長中四人，是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主席，互助合作國會議長，全國計劃委員會主席和臨時最高評議院副主席（主席由總統自兼）。

(丁) 分設國家領導層會議與工作內閣會議。○參加國家領導層會議者，為總統、首席部長、副首席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和部長。

改組後工作內閣的八個組，每組所轄各部部數不等。首席部長仍為尤安達，外交組領導人為蘇班德里奧，自兼外交和對外經濟關係部部長。國防治安組，下轄國防、警察、檢察、退伍軍人等部及陸海空三軍三個參謀部，領導人為納蘇申上將兼國防治安部長。內政組領導人薛哈佐（*Saharajo*），轄有普通行政自治區事務部，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生產組領導人為蘇伯拉約基（*Suprajogi*），轄有農業土地部、勞工部、公共工程部，基本工業及礦務部，民間礦業部，民族研究事務部。分配組領導人為雷孟那，轄有陸運郵電旅行事務部、海運部、空運部，合作事務部。財政組領導人諾多哈米布羅佐（*Notohamiprodjo*），轄有國家收支監督部，國家預算事務部，中央銀行事務部。人民福利組領導人慕里亞第（*Muljadi Djojomartono*），轄有宗教部、社會部、衛生部，基本教育文化部，大學科學事務部，體育部。特別組領導人阿都干尼（*Ruslan Abdul Gani*）（原係耶明*Mahammad Yamin*，病故後由阿補缺），轄有情報部，國會、人民協商會議，最高評議院與國家計劃委員會聯絡部，宗教長老聯絡部，及部長銜民族陣線祕書長。此外總統助理伊哇古蘇瑪（*Iwakusuwa Sumantri*），亦被任為不管部部長。

解蘇卡諾的苦衷，但他對於混入印尼內閣的企圖，則並未絲毫放鬆，印共書記艾迪於今年一月九日發表一項聲明，要求蘇卡諾根據「納沙公」的原則改組政府，容納共黨入閣，並組織以總統爲首的互合作整頓委員會，以革新政治，改善經濟措施，克服國家的當前難關。蘇卡諾於一月十八日宣佈設立十三人「革命領導輔助委員會」，由國民黨、回教黨及共產黨的領袖、三軍參謀長、國防及外交部長、議長和其他四位閣員組成，職責在協助維持內部治安，應付經濟危機。這個機構又儼若另一個核心內閣，也可說是改組內閣的試探。同時首席部長尤安達即藉口健康不佳，表示消極（尤氏早即一再因病休假，前在蘇卡諾出國訪問期間，亦未代行總統職權，而由雷孟那攝），回教神學會以及基督教黨均表示不願與印共爲伍，國防治安部長兼三軍聯合參謀總長納蘇申則對萬隆大學生演說，很露骨的反對印共入閣，只有印尼國民黨主席阿里發表聲明，以避免內戰爲理由，贊同容納印共。而蘇卡諾於五月十一日和蘇班德里奧及雷孟那兩人，會談九十分鐘，又被傳說與改組內閣有關，認爲他們兩人有被徵求出任首席部長的可能。五月十五日人民協商會議於萬隆開幕，蘇卡諾在致詞中還是聲稱：「將在組織和人事兩方面，把我的助手陣容，再加改善與調整」，正好像「內閣的改組」是勢在必行，但是就在這時，襲擊華人的暴行發生了；於是，在他匆匆的去國之前，再也未見提出改組內閣的話，出國後的總統大權，依然交由原來的首席部長尤安達代理。從這一點來看，也就不難測知此次騷亂的真正背景在那裏了。

二 情勢嚴重的經濟危機

最使印尼感到問題嚴重，而無法克服的，是經濟情勢之日趨惡劣，通貨膨脹，如天文數字的直線上升，加以天災人禍，到處匱餉，鬧窮。印尼的學生因食米缺乏，每天只有一餐飽食，印尼人民呻吟在飢餓線上，掙扎於死亡的邊緣，漸漸覺悟到其所以致此的原因，固然小部份是由於天災，但大部份却由於人禍，更因政府貪污無能，蘇卡諾措施乖謬，前財政部長兼印尼銀行總裁洛曼哈金憲而辭職了。蘇卡諾只知口若懸河，創造一些奇特的名詞，自認爲他的「北

極雙星」，即其所謂「領導民主」和「領導經濟」，可以將印尼拖出政治和經濟的深淵。結果不僅事實和他所說的完全相反，而且還在其「領導輸出制度」和「領導建設計劃」之下，輸出日益縮減，八年建設計劃亦告停頓，全國計劃委員會主席耶明亦飲恨而終。

蘇卡諾爲掩飾他的通貨惡性膨脹，下令印尼銀行，自一九六一年一月份，關於金融發展情勢，停止向外發表。其在一九六〇年底，通貨發行增加至四百六十二億盾，較一九五九年底的三百四十八億八千萬盾，計增一百四十四億盾。一九六一年底，發行額達六百四十四億九千一百萬盾，一年之內又增一百八十三億盾。一九六二年增加更速，政府雖未正式公佈，但據宣傳部長阿都干尼在一九六三年的聲明中說，通貨已超越一千億盾。再據一九六二年的預算，收入爲六百億盾，支出爲九百六十億盾，赤字達三百六十億盾，亦不容易推算出通貨增加的數額。再據另一非正式的官方報告，一九六二年赤字，因爲西伊里安的軍費浩大，計達四百五十億盾。一九六三年初，貨幣流通數額，最保守的估計應達一千二百五十億盾，較之一九六一年底要增加一倍。一九六三年預算，據軍事最高方面透露，軍費將佔百分之四十七，一九六二年則佔百分之八十。自一九五八年發生內戰以後，印尼歷年的軍事費用，都要佔到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九六二年因所謂「解放西伊里安運動」，支出特多。現在西伊里安問題已告解決，軍費本應降低才是，但因其在目前擁有力軍卅五萬人、海軍五萬人、空軍九萬人（空軍有其自己的地面部隊）和足以誇耀的一萬九千噸巡洋艦「西伊里安」號，以及米格21、19、17、15轟炸機戰鬥機等，其平時的維持費用，再加上必需攏還的蘇俄和捷克的軍事貸款，使其不能不依然保持龐大的軍事預算。更加蘇卡諾繼接管西伊里安之後，又圖染指北婆羅洲，支持婆羅乃叛黨，滲透沙勞越內部，反對馬來西亞組織，對於這種瀰漫着的冷戰氣氛，最爲敏感的，當然就是極度動盪印尼財金情勢。

至於印尼的美元儲備，一九六〇年尚有三億元，至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即下降至一千萬元。可兌換的外匯儲備，也下跌至不能再行公佈。黃金儲備也由一九五七年的五億零一百萬盾跌至一九五九年的一億五千萬盾，後來還繼續暴跌。印尼由輸出所賺得的外匯，也

逐漸遞減，這說明生產衰落，輸出減少，雖然對於輸入嚴加限制，但入超數字年有增加（據印尼中央統計局發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入超一百八十億盾，較一九六一年同一時期的入超一百五十一億增加二十四億盾）。印尼盾對外匯率，依照規定價格，一美元為四十五盾，黑市現達二千盾以上，其對外收支的逆差可想而知。

印尼過去兩次抑制通貨膨脹都是採取「殺雞取卵」的手段。第一次一九五〇年是用剪幣的方法，規定把五盾以上之紙幣，一剪為二，一邊以面額二分之一的價值繼續使用，至一定時期兌換新幣，另一邊的二分之一價值，只能向印尼銀行換購三釐公債。此後通貨繼續膨脹，屢傳政府將作第二次的剪幣措施，雖經一再闢謠，且以同教「割禮」作譬解，謂回教徒只能施行「割禮」一次，印尼幣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的剪割。但在蘇卡諾恢復一九四五年憲法，實施「領導民主」以後的「領導經濟」政策之下，其第一個措施，即是

收縮通貨，其辦法是於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日下令，將百元以上的大鈔，一律削減面值百分之九十，實開世界財政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在這個措施之下，雖然會將當時流通貨幣由三百二十二億盾縮減至二百二十億盾，同時還凍結銀行中客戶存款的百分之九十，作為國家的長期債務，但是未及三月，通貨又回到原有膨脹的數額，搜括所得，全部化用淨盡。

一九六一年九月，蘇卡諾又決定頒佈總統第七十號決定書，定名流通貨幣改革辦法，規定以「過帳方式」，來代替付款，即以票據交換的轉賬方式，限制現金使用，使貨幣流通額減少，以遏止通貨的繼續膨脹。無如運用票據，弊竅更大，以致這一措施，曇花一現，即告夭折，使在金融史上的留下一個笑話。

在對外貿易方面，以國家外匯支紓，雖曾開放自備外匯，獎勵商品輸入，但是以政府過去在金融上毫無信用，商人深恐貨品脫售之後，資金回頭為難，所以成效不著。為鼓勵輸出，一九六二年二月又頒佈「促進輸出與輸入新條例」，輸出商保留百分之十五的輸出外匯，作輸入貨品之用，但亦無補於事。本年一月，人民協商會議提出「緊急的經濟行動必須迅速付諸實施」一案，最高評議院亦舉行會議，由蘇卡諾親自主持，討論穩定經濟辦法，但均無具體的決

定。蘇卡諾也會召集商業部、工礦部和中央銀行事務部三部部長商談，會後僅由商業部長發表聲明，決不採取「剪幣」的措施，認為在穩定經濟和財政方面，將設法提高生產，以期收支平衡。蘇卡諾遲遲於三月廿八日發表一篇「經濟聲明」，重申不再採取如貶值、剪幣、和發行新幣等金融措施，並指出印尼還是決心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保證每個人有工做，有衣穿，有飯吃，有屋住，還有正當的文化和物質生活。同時提出所謂短期經濟措施的重點，是以衣食為優先，即是人民必須有衣食兩項供應無虞的保障。但事實的發展，却正和蘇卡諾所保障的完全相反，人民開始有點不耐了，各處學生為要課本而遊行，工人為要飯吃而示威。在萬隆排華暴動中，學生們所掙起的標語有「我們要飯吃，我們要衣穿，我們不要演說。」還有「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嗎？」的諷刺漫畫。連蘇卡諾也不否認，這次的襲擊華人暴動的背景是在反對他的政權。

三 不擇手段的政治權術

蘇卡諾既沒有自己的軍隊，又沒有自己的政黨，他之所以能够維持他的獨裁統治，完全靠他的政治權術。他不分敵友，更無視忠奸，只要有利於他的政權保有，他可犧牲任何人，也可聽命於任何人。在一九四五年宣佈獨立之初，他的勁敵是所謂民族共黨丹馬拉加（Tan Malaka）派，所以他聯合右翼的社會黨、瑪斯友美黨和那時力量極微的印尼共產黨，經過兩年的鬥爭，共同打垮了丹馬拉加勢力。一九四八年，他見共黨勢力太過膨脹，對荷戰爭又趨失利，於是又欲討好美國，冀圖藉着美國的力量，來壓迫荷蘭對他讓步。於是他拉緊右翼政黨，實行剿共，除印共頭子摩梭（Moso）於逃亡中中彈陣亡外，被俘的共會十四人，包括曾經做過他的內閣總理和國防部長的沙里辛丁（Amir Sjarif Edzri）在內，一律由蘇卡諾下令槍決。所以一九四九年底印尼在美國的幫助下正式由荷人手中接收了政權之初，蘇俄和中共一致痛罵蘇卡諾是劊子手，稱蘇卡諾政府為「美帝」的傀儡。但是會幾何時，蘇卡諾為着不忍坐視右翼民主勢力的增大，而致阻礙了他的個人獨裁野心的實現，於是又開始向他革命時期的戰友和功臣開刀了，最後連和他患難與共一向

行會議，由蘇卡諾親自主持，討論穩定經濟辦法，但均無具體的決

開始向他革命時期的戰友和功臣開刀了，最後連和他患難與共一向

稱為「兩位一體」的哈達(Mohammad Hatta)副總統亦終被迫下台。同時又把已經瀕於絕滅了的印尼共產黨培植起來，發展到現在，竟然成爲擁有黨員二百五十萬人的印尼合法的三大政黨之一（幫助蘇卡諾奪得天下的社會黨和瑪斯友美黨則均被取締）。

蘇卡諾現在所玩的還是這套手法。在國際上，他玩弄美、蘇，於是右手受美援，左手取俄貸。他使俄國相信，惟有保持他的存在，印共才可獲得發展。又使美國相信，只有安撫他的政權，印尼才可免赤化。在共產集團之間，他又玩弄着黑、毛，馬林諾夫斯基剛走，劉匪少奇就來。在亞非集團之間，他拉攏了迦納的恩克魯瑪和馬利的基泰等人，來對付尼赫魯和納塞。在國內，他之所謂「納沙公」，即在平衡民族政黨、回教政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力量。在軍事上，因爲陸軍統帥納蘇申始終是他的獨裁政權的一大威脅，同時納蘇申和其陸軍幹部始終與哈達和社會黨、瑪斯友美黨以及印尼的反共勢力，保持着相當的友善關係，所以他一面全力拉攏空軍海軍，以對抗陸軍，一面又在陸軍裏面，扶植一批爪哇同鄉，以對抗納蘇申的外島軍人。出身爪哇的耶尼(Jani)之得升任陸軍參謀長，就是蘇卡諾加諸陰謀分化陸軍的結果。同時，蘇卡諾在陸軍與印共之間，也還作了巧妙之運用。印共力量之飛速發展以及其對蘇卡諾所表示的無條件的擁護，使陸軍不能不有所戒懼，不敢輕易發動政變。而在另一方面，蘇卡諾也利用了陸軍的堅決反共，制止了印共的輕舉妄動。

今天蘇卡諾的左右，最親信的都是革命初期反對蘇卡諾最烈的一些丹馬拉加信徒，其次即是各種政黨的叛黨份子。屬於前者，如人民協商會議長亥魯沙勒(Chairul Saleh)，曾被蘇卡諾監禁多年，後被放逐國外，一九五六年才獲准返國。今天印尼駐匪區「大使」蘇卡尼(Sukarni)、駐蘇俄大使阿丹馬力(Adam Malik)。都會劫持過蘇卡諾，使蘇加諾失去自由兩天。去世不久的全國計劃委員會主席耶明近幾年來一直是蘇卡諾的智囊，曾因迫宮事件被蘇卡諾收押監禁了兩年有餘。屬於後者，如首席部長尤安達，是反蘇卡諾的巴巽丹陣線的轉叛份子，外長蘇班德里奧，爲社會黨的叛黨份子。福利部長摩里亞第，爲瑪斯友美黨的叛黨份子。今天和他合作的回教政黨，就是叛了瑪斯友美黨的一幫回教長老的組織——神學

會(N.U.)。至於革命時期的功臣如沙里爾(Sutan Sjahrir)、隆姆(Mohammad Roem)、沙佛魯汀(Sjafruddin Prawiranegara)等人，今日則均成了蘇卡諾的階下囚了。

蘇卡諾職位之能保持不墜，人們每把他歸功於其本身的毅力堅強，却不知道也因得力於他之能屈能伸，他最會虛張聲勢。大言不慚，好像真是一個不知退却的革命鬥士。不知他在他的國內鬥爭中，最會看風轉舵，這些例子很多，最顯著的一次，就是一九五三年的陸軍參謀長事件。那時納蘇申還因一一七事件被蘇卡諾撤職查辦當中，陸軍參謀長班邦蘇根(現駐日大使)辭職，蘇卡諾乘機任命一個爪哇人班邦烏多約(Bambang Utjo)來接替，陸軍反對，蘇卡諾態度堅強，不予置理，正式在總統府舉行授任式。陸軍一致抵制，拒不移交。待蘇卡諾知道無法挽救的時候，乃卑躬屈膝，商請陸軍給他一點顏面，准許新任到職後，即行辭職，并以撤換親共的國防部長作爲交換條件，陸軍還是不願妥協，結果蘇卡諾一走了之，自己逍遙國外，請哈達來收拾殘局，不僅把他的任命收回了，而且還把他的政敵納蘇申的陸軍參謀長職位再行恢復起來，蘇卡諾只有接受了事。

去年西新畿內亞之得和平的移交印尼，就是得力於他的虛張恫嚇，現在他又運用同樣的手法來對付北婆三邦了。不過今天的情勢，畢竟不同。第一，馬來亞不是荷蘭，他與印尼同文同種，同是新興國家，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帽子戴不上去。第二，北婆毗鄰馬來亞，又有英澳軍事之支援，與西新畿內亞之於荷蘭的情勢不同。第三，馬來亞在印尼沒有投資，無所顧忌，星馬倒可以扼制印尼的貿易往來，更可作爲印尼革命份子的庇護所接濟站，足以危害印尼的地方較多。看起來，再想如西新畿內亞一般垂手而得，恐怕不容易了。

四 結 論

近日報載，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何斯曼對菲美商會演說，稱蘇卡諾是「共黨目標的障礙」，又說「巨大的印尼共產黨正在靜靜地組織和計劃，以等待蘇卡諾不復在位阻撓他們的一天

來到」。何斯曼先生沒有看清楚，在印尼阻撓共黨發展的不是蘇卡諾，而是反共的陸軍。何斯曼先生更沒有看清楚，印尼共產黨之所以能够在那裏「靜靜地組織和計劃」，所以能够於復活後又飛躍的擴展，完全得力於蘇卡諾的一手培植。早在六年以前，蘇卡諾就高唱四腳馬的內閣，即國民黨、瑪斯友美黨、神學會、共產黨的聯合內閣，終因陸軍和兩個回教政黨的反對而未果。現在，瑪斯友美黨被取締了，於是又唱「納沙公」內閣，目的還是要印共入閣，阻撓他的還是陸軍。蘇卡諾今天不但不是「共黨目標的障礙物」，而且還在全力摧毀真正的「共黨目標的障礙物」——印尼陸軍和反共政黨愚昧的成果。馬克思和列寧曾說：「印尼共產黨決定收刈貧窮和利益」。何斯曼先生却不知道印尼這樣資源富有的國家，其所以致於如今的一貧如洗，完全是由於蘇卡諾愚昧的「領導經濟」所造成的。蘇卡諾正是「引導共產黨達到勝利」的禍首。尤其不幸的，何斯曼先生認定蘇卡諾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否定蘇卡諾政權是親共的（見本月廿五日聯合報專電），這正如十六年前的美國主政者認爲毛匪只是「土地改革者」是一樣的錯誤和危險，使我們不禁爲一億印尼人民及整個東南亞的安全而隱憂。

這次印尼各地發生的暴民襲擊華僑事件，完全是由於人民懷恨蘇卡諾的親共措施，因爲印尼人民懷怨其生活上與中國大陸人民一樣陷於絕望的境地。事件爆發於劉匪少奇甫經訪問印尼之後，又在劉匪少奇等接受款待的萬隆茂物等地。在萬隆，華人商店被破壞得最慘的就是甫由赤色嘍囉們用作「歡宴」劉匪的華僑餐館。蘇卡諾已經承認，這次的事端是「反革命者」所爲，目的是在打倒他的政權，從茂物他所經常駐在的行館附近的暴亂情形來看，就可知他在治安上已經完全失却控制的能力。於是，他又出國休假去了。

蘇卡諾已經不祇一次地在他的國內極端紛擾中拋開一切，逍遙國外，其作用是在藉國外的活動，來挽回他國內的威望，再圖捲土重來。他很瞭解國內外的各方心理，他瞭解國際上的人情冷暖，很現實的。他有將近一億人口需要食用，又有那樣多的資源可供開發與輸出。只要他仍維持總統的職位，不怕到處不受到「友邦」

禮遇。他更知道他的人民是那樣的無知而易欺，當他把到處受到國營局禮遇的情形報導給印尼人民的時候，他在印尼人民的心目中自然又會改觀過來，他的嘍囉更會爲他爭辯：「外國人都擁戴他，爲什麼我們自己反要毀滅他呢？」果然，他經菲律賓，馬嘉伯舉總統迎接歡宴，與他商談菲印馬三國舉行高階層會談問題，到日本，重返世運的問題又被提起，如果他成功了，自然又是他的大勝利。就在這時，何斯曼先生還爲他捧場，稱讚他是印尼共黨發展的障礙，如此，則印尼國內的反共政黨和軍人還有什麼理由和勇氣來推翻他的政權呢？

無疑的，今天蘇卡諾政權已經面臨到一種嚴重的考驗。經濟破產是死結，反共勢力的抬頭是他的致命的威脅，如果馬來西亞問題，馬來亞和西方國家能够堅定立場，不再墮入他的瞞詐的圈套，國際政客能把目光放遠一些，不再太過現實，並且不再有如何斯曼先生那樣完全不顧事實的爲他撐腰，則印尼政局的改觀，不是全無希望的。

五二、五、廿六日、台北

本刊徵稿簡約

(一) 本刊園地公開，登載有關國際問題與敵情研究之專門論著與動態分析，新書簡介以介紹國際間有關最新出版品為主，並歡迎海外通訊。

(二) 本刊每月刊行一次，每月十日出版，二十五日截稿。

(三) 論著或通訊以五千字至七千字為度，新書簡介約二千字左右，但經特約者不在此限。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作者不願增刪者，請於來稿時註明。如係譯稿請附寄原文。

(四) 來稿請載明作者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本刊採用之稿件，一律用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其願使用筆名者，請於來稿時載明。

(五) 來稿一經採用，稿酬從優，於本刊出版後致送。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六) 來稿請寄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本社或台北郵政信箱一八九號。

發與輸出。只要他仍維持總統的職位，不怕到處不受到「友邦」由

曲爾斯西歐記

陶鵬飛

一 中共的境遇困難沒有出路

本年五月底史丹福大學學生組織的「外交研究會」，舉行了三天第六次的年會。這次討論的題目是：「中蘇衝突對於美國外交的影響」。作專題講演的有：霍斯新聞總主筆霍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Jr. 新任美國駐印度大使鮑爾斯 Chester Bowles，國務院遠東問題研究與分析組主任懷丁 Allen S. Whiting，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中蘇衝突」的著者查勾里亞 Donald S. Zagoria，同時有九個討論小組，配合這四個講演。這幾個講演人中，鮑爾斯（見右角照片）的意見，對於我們最有興趣和最重要。鮑氏是有名的自由分子，可以說是美國自由分子，關於國際問題的發言人。他的偏於和共產集團妥協的主張，在美國輿論上不斷引起激烈的爭辯。有的極端反對他，有的極端贊成他，也有人相信，因為甘迺迪總統不贊成他的妥協政策，才把他從助理國務卿，改任為「亞非南美問題的顧問」。但是無論如何，他的言論，也時時引起國內和國外的注意。他的寫作和講演又非常多。不久以前出版的第八本著作「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天良」，已經變成暢銷的讀物。他日內再去印度，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外交官，在同一國家，作兩次的大使。

鮑氏這次講的題目是：「中蘇對於新發展國家的影響」。他首先重申：「自一九四五以來，我們經過世界上最大的，近百年來空前的劇烈變遷。此外好像每一個變遷，又養造成一個新的變遷。在這樣極端複雜的世界上，如果只認為是美國和蘇俄兩個的鬥爭，他們都是旁觀者，那是太簡單化啦。」

「世界不能安靜不動下去，局面也常常不是我們以為應當演變的局面，因此我們很感覺失望和困惱。另一方面蘇俄雖然是一個強大和成熟的國家；但是它自己的社會內，也有很多正因為共產制度，造成特殊的問題。」

「蘇俄在近幾年內，在軍事、工業和科學方面，固然有迅速和驚人的進展，但是它對內對外，都面臨極嚴重的困難。蘇俄政府不能同時又教育人民，又控制人民的思想。一面要增加人民的生活水準，一面又擴充軍備、重工業，以及發動侵略性的外交。黑魯曉夫本身，確已感覺，十分困惱。在戰後十八年的期間，共產政權，施行徹底的統制，不斷的洗腦，但是還要建築一個『醜牆』，去防止附庸境內的人民，向所謂『惡劣』的西方奔逃。如果我也需要一個牆，防止西方的人民向共產國家奔逃，我們將要作什麼的感想呢？」

中共在大陸上的表現更糟。

「蘇聯在伊拉克和埃及，投資了很多外援；但是並沒得到兩國的友誼。在一些非洲部分，『醜惡的俄國人』，作出『醜惡的美國人』所有作過的錯誤，同時更進一步，作些我們絕對想不到的錯誤。總括來說：蘇俄雖然強，但是不能達到它要想達到控制世界的目的。馬列的主義，已經證明，不適合於目前的世界。」

「美國的問題是：我們的社會，是否適合於目前的世界，我們能否變成世界上的一部分，能否主動的參加，新起國家目前爭取民權，極端個人的自尊。我們必需決定，美國革命的概念，對我們有多少意義，或者有多少，只是口頭說說而已。我們自己在民主方面能作到什麼程度，是最決定性的關鍵。在這方面，下面的三點特別重要：

「一、我們認識其他人民的程度如何？我們必需認識世界上窮

苦的地方和人民，即或他們的理想，有時對於我們好像是過於激烈。我們要知道，每個偉大的領袖，都使和他同時的人驚慌恐懼；獨立的國家，使它們能自己站得住，有維護生存和自由獨立的能力。它們用不着，一定和我們同意。我們反對它們俄化，我們也不要它們美化，我們更不想控制它們；

「三、我們自己國內社會健全的程度如何。我們能否發展整個經濟的力量，我們能否完成我們實行民主上的任務。

「如果我們能作到前面的三點，我們才能推動真正的革命，才能造成我們想要造成的世界，如果成功，美國將是歷史上唯一有力量和有特權的國家，能面對事實，而最後不被變遷所掩沒。」

上面是鮑氏對於世界演變的基本看法。我們最注意的，當然是他對於中國問題的意見。下面的講演，對問者的答覆，我和他的談話，都是關於這方面的意見：

「因為本來的資源基礎貧乏，在食糧方面，中共已經面對不能解決的問題。大陸上能耕耘的土地不夠，可以說沒有充分供給人民食糧的土地。在肥料工業方面，在十年到十二年內，都沒有能力趕上需要。大陸人民每天的卡洛里大概是一千四百到一千三百五十，可能比這個數目還少。百分之五十的油，是由蘇俄供給，所以中共必需外面的援助。因此經濟問題，是中共和蘇俄分歧的關鍵。

「中共充滿了馬克思主義解說的空氣，但是這些理論的爭辯，只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並不是真正的目的。中共需要的是，蘇俄軍事、經濟、農業、和工業方面的援助。毛澤東可能想和蘇俄恢復關係，以求得到蘇俄的援助。但是我以為這樣的可能很少。因為對於黑魯曉夫，建設蘇俄是第一目標，加上蘇俄也不會作傻瓜，用援助去建設一個將來對付自己的鄰邦。特別是中國人並沒有忘了帝俄時代的侵略，並沒忘東西伯利亞地帶，本來是中國的領土。因為這些原因，黑氏不會幫助中共，即或有也不會大量的。事實上蘇俄對於中共援助，已經減少，所以毛澤東希望推倒黑氏，可是這個可能性也很少。」

「中共另外的一個出路是：向豐富的東南亞發展，從那方面爭

取原料。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用戰爭方式，先佔領東南亞。土地，這樣舉動又一定引起美國的抵抗，美國決不允中共佔領東南亞。」所以總括來說：中共已經處在困難的境遇，沒有出路，這樣的境遇，可能使它任何事都能作出來，完全的忽然東一下，忽然西一下，分裂、瓦解、輕率的侵略。因此在最近幾年內，中共將變成最危險、最不容易相處的國家。」

二 蘇俄沒有大量援助中共的能力

鮑爾斯講演後，我和他並肩坐在車中，同去參加一個歡迎會，這樣得到一個好的機會，下面是我們的談話：

鮑：「我很高興，你來聽講演，我想我並沒說出什麼新的東西，我很願意知道你的意見。」

陶：「我十分同意，你指出經濟是中蘇意見分歧的主要原因。

我想美國和中國政府的堅強外交，也是使它們衝突的原因。一九五八年金馬問題的發展，是很好的證明。中共沒有蘇俄經濟上的援助，解決不了內部的問題，沒有軍事上的援助，達到不了侵略的目的。特別解決不了台灣問題。只要自由中國存在，中共的政權就不穩固，自由中國越強，中共垮台的日期越快。中共想在蘇俄核子的傘罩的衛護下，藉着蘇俄的援助去進行侵略的行為，理論不理論，並不重要，不知你以為對不對？」

鮑：「中共當然希望這樣，但是我認為，蘇俄決不會這樣作。我方才說過，蘇俄不願意有一個強大的中共作鄰居。此外蘇俄的力量也有限，對內對外又有許多困難，所以沒有大量幫助中共的能力。」

陶：「還是因為這個原因，西方國家應當對於蘇俄和中共，雙方繼續增加壓力。對於中共的壓力越大，中共越需要蘇俄的援助，對於蘇俄的壓力越大，蘇俄越不敢援助中共。這樣它們的分歧，要越來越激烈。在這方面的發展上，美國能發生主動的力量，並不是一個袖手旁觀者。中蘇共同的目的，不是要埋葬美國嗎？你看中蘇的關係，將有什麼的發展呢？六月間的中蘇會議，能有什麼結果呢？」

的關係，將有什麼的發展呢？六月間的中蘇會議，能有什麼結果呢？」

鮑：「蘇俄不會給中共援助，中共將永遠不會滿意，可是中共也沒有方法和能力，對付蘇俄。因此我看仍然這樣拖延下去，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

「蘇俄也不會和中共決裂，把中共排斥出共產主義的集團。因爲除非蘇俄準備，變成狄托式的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會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同時蘇俄也怕在國際上，使共產主義『丟臉』。」

「在純粹理論方面，遠東方面的共產黨，比歐洲方面的共產黨，比較激急。歐洲共產黨的首領們，已經變成一種共產式的小資產階級。」

陶：「有政權的共產黨和沒政權的共產黨，想法和看法不同，政權穩固和不穩固的，想法和看法也不同。但是它們最後的目的，總是一樣，所以所有反共的力量都應當合起來，去阻止它們達到最後的目的。從這方面看，你以爲我們中國和印度的關係，是否應當改善呢？」

鮑：「應當。現在不是已經比以前好了嗎？印度因爲過去十年內美援的關係，工業的發展和受教育的兒童增加一倍，電力增加三倍，現在甚至於願意抵抗中共。這樣事，是它十年前絕對作不到的。」

陶：「你知道中國從來主張印度獨立，因爲這個原因，我們曾經得罪了英國，使我們在抗戰時和戰後，吃了不少虧。英國採取了很多對我們不利的行爲。羅斯福總統，雖然是以反對殖民主義著名，但是仍不願意，因爲印度問題使邱吉爾不高興。可是蔣委員長夫婦，反在抗戰的期間，不顧英國願意不願意，到印度訪問很多天，受到印度人民熱烈的歡迎，這足以證明在任何情形下，中國都是講道義的朋友。不知道美國是否有興趣，看見印度和中國的關係，逐漸改善？」

鮑：「美國當然有興趣。我想國民政府過去對於印度的好感，印度人民當然還不會忘記」。（可惜鮑氏並沒表示，美國政府是否有意思，努力幫助改善印度和我們的關係）。

陶：「中共因爲什麼忽然向印度進攻，忽然又停頓？」

與鮑爾斯晤談記

達賴喇嘛，不滿意尼赫魯和蘇俄表示聯絡，要給蘇俄看看，中共進攻別人的能力，要藉着對外戰爭安撫國內人民不滿的情緒，也可能因爲印度軟弱，侵略容易成功。梅農確實把印度的國防，弄的一團糟，可以說是不能想像的糟。」

「進攻忽然停頓，可能的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作戰需要很多的汽油，用汽車載運汽油，汽車本身就消費很多汽油，路程又遠，是非常困難的問題。可能中共已經用盡它最大的力量，因此必需停頓一下再說；二、在中共進攻時，印度的飛機並沒有開動，主要恐怕印度飛機一出動，可能引起中共的報復，用飛機轟炸新德里等重要城市，後來美國和英國聲明，準備擔任印度的空防。這樣戰事再下去印度自己空軍就可出動，同時又不用顧及中共報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只是聲明，還沒有那樣作，中共就停止進攻，提出談判了。」

陶：「你什麼時候起程去印度？」

鮑：「大概六月中。我還要到其他遠東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等看看。」

陶：「你是否也去台灣，我很希望你能藉這個機會，也到台灣去看看。」

鮑：「我已經好幾年沒去台灣了，我很願意再去看看。但是要看我的時間怎樣，我也許需要在西貢停些時間。我想台灣的情形，又比我前幾年在那裏的時候，進步多了。」

本來還有很多問題，想和他討論，可是正在談到台灣的時候，車子已經停在歡迎會門前，有很多人在那迎接，我們只好匆匆的握別。最後我祝他這次到遠東的使命成功，並且希望他能抽出時間經過台灣。他一面謝謝我的好意，表示願意以後通信聯絡，一面被人擁進大廳。差不多一刻鐘後，他就趕往飛機場，回華盛頓去了。我在車上能和他談相當時候，也是意外的收穫。

三 得到的感想

參加這次的討論會，特別是和鮑爾斯談話後，得到一些感想：

記在下面供作參考。

一、大多數的美國人，包括一些所謂的專家在內，雖然知道中蘇衝突的重要性，但是多是道聽途說，對於問題本身的來龍、背景，發展和影響，缺少真正的認識。政府方面也好像要聽其自然發展，沒準備藉這個機會，進一步減削共產的勢力。就是右派的霍斯特，也認為中蘇劇烈的爭論，目前沒有停止的象徵，美國不應當根據現有的蹤跡，去下不明智和可能自己使自己失敗的結論。因此仍然是等「塵土落地」，雖然根據以往的經驗，「等等看看」的政策，帶來了很多的失敗。

二、因為歷史傳統環境，以及過度怕戰求安的心理，美國在外交方面，很難改變被動的想法和作風。同時也不會像蘇俄一樣，利用核子傘罩，去爭取冷戰中的勝利。美國政府和大多數的人民，固然拒絕「不勝主義」，但是也不完全採取「贏得勝利主義」。參議員弗爾布萊特 Fulbright 和輿論家李普曼，又高唱美國不應當爭取全面勝利。

因此在冷戰中，美國只是採取幾次被動「補牢」的行為，而沒有主動「找羊」的意志。美國是永遠怕牽連的，因此，它的盟邦，在決定本身的政策戰略時，也不能永遠等美國在國際上，自動的主動起來。兩次大戰中，英國的政策，目前戴高樂的政策，都是好的證明。

三、鮑氏強調美國絕對反對中共佔領台灣。但他並沒有說，美國也反對中國政府反攻大陸。其實美國並不是不希望我們收復大陸，而是主要懷疑大陸上的人民能否起義援助，以及蘇俄能否參戰。目前已經有很多證據，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能」，第二個的答案是「不能」。

美國曾經打過很多性質不同的戰爭，但是從未打過民族解放的戰爭。因此有的人想像，如果國軍登陸，將要面對大陸上幾萬萬的敵人，有的人想像，一定要從東打到西，從南打到北，才能打垮中共。有的更以為，只是因為一些人要回「老家」，才主張反攻。我們必需使他們明瞭，民族解放戰爭，是內力和外力合起來的戰爭，是登陸加上危急的戰事。大陸上的人民不是敵人，而是伙伴。

；反攻的目的，不是回老家，而是拯救受壓迫、受難的同胞，同時每個中國人，都有並且願意負起這個救民復國神聖的責任。蘇俄爲着自己的利益，決不願意捲入這樣的民族解放戰爭，更不願意因爲參戰而引起全面戰爭，使自己的生存受威脅。

我國政府曾經屢次聲明：「反攻復國爲吾人既定國策，乃毫無疑問者。」但是美國所關切的，疑慮的，要諮詢的，不是我們的國策，而是我們怎樣準備，以及有什麼把握，貫徹這個國策。要使美國人相信，反攻必定勝利，在政治和戰略方面，必需供給它們具體的、合理智的說明、分析和證明。如果我方能召集一個學術性的戰略討論會，也能收到相當的效果。

四、近幾年來，很多外國人士，盛讚台灣各方面的進步，就是對我們不友好的，也不否認這個事實。這當然是值得自豪的。但是這個進步，也只是達到目的的方法，並不是目的。是用這個方法，去達到復國建國的目的。對於這點，很多外國人，也弄不清楚，因此認爲台灣應當心滿意足，安靜下去，不應當再作反攻打算和冒險。

。好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五、當鮑氏講完，看見我走上台子的時候，他沒等主席介紹，就很親熱的向前和我握手。他這樣表示客氣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中國人不滿意他的政見，或者他很少有和中國人見面的機會，或者願意聽聽中國人的意見。

我個人也時時批評他的論調，因此起初既不想聽他講演，更不想和他晤談。其實鮑氏本人，却非常虛心，很願意聽別人的意見，不管別人的意見，和他自己的相同不相同。美國一些知識分子和自由份子，本性是反共的，反對共產的理論和制度，只是因為有時天真、幼稚，認不清敵人，說的寫的才常常無形中幫助了共產勢力的發展。我們的談話，即或不能改變他原有的意見，至少能使他對於中國問題，增加些了解。

因此我國政府應當，除了對我們友好的朋友以外，也要或者更多請一些，對我們不了解的、有誤會、有偏見、或者有反感的，到台灣去。就是沒有好處，也決對沒有壞處。他們如果能少說我們的壞話，就算有利；如果能替我們說好話，發生的效力當然更大。

戰爭，是登陸加上起義的戰事。大陸上的人民不是敵人，而是伙伴。

匪俄爭執的幕前幕後

懷遠

匪俄爭執既深且廣，在一次會談中勢難充分交換意見，故七月間的會談，可能是一連串談判的開端，包含黑毛高層會議及國際共黨會議，而黑毛高層會議與國際共黨會之能否召開，將是測驗七月會談有無成就的主要試金石。

從去年十一月開始，延續達半年之久的匪俄大論戰，至今年四月間大致告一段落。二月至五月間，雙方經過將近三個月的衝折，始商定於七月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兩黨會談，協調政見。這次會談能談出什麼結果，是使匪俄冷戰冰解，還是更加深分歧，導致決裂？要解答這個問題，必先揭開圍繞匪俄關係的重重幕幛，對其因何由密切勾結轉化為劇烈衝突的真相，作一客觀的探索。

共匪篡奪大陸後十四年來的匪俄關係，可概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起自三十八年十月偽政權成立，止於四十二年三月史達林去世。這一階段匪俄關係的特徵是：共匪賣身投靠蘇俄，參加由蘇俄擔任「家長」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家庭」，對蘇俄有很多奉獻；史達林看待共匪則甚為嚴酷，他貪婪的向共匪索取供養，但僅給予有限的照拂，匪俄就在這種不平等的基礎上連成一體。

在偽政權成立前夕，匪酋毛澤東力排中立與親美之說，宣佈向蘇俄「一面倒」。毛匪的「一面倒」包含：（一）模仿蘇俄早年的革命藍圖，赤化中國大陸；（二）追隨蘇俄的對外擴張政策，承當共產情報局交付的指導落後地區共產運動的重擔；（三）與蘇俄簽訂一連串喪權辱國的條約和協定，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確立對蘇俄的深切依存關係，並允諾蘇俄使用旅順海軍基地及大連港，合資開發新疆的石油與其他礦藏，合營長春鐵路與民航事業，即承認東北與新疆的特殊化。但是，共匪付出如此鉅大的代價，僅換得蘇俄三

億美元的長期貸款，與新建、改建五十個工業項目的援助。而共匪設若改變其對外政策，走狄托化的道路，不倒向蘇俄的懷抱，則將獲得可能高達五十億的鉅額美援。

共匪另外還有兩項收益：（一）與蘇俄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蘇俄承諾保障其安全；（二）得到大量的軍事援助，在韓戰期間，蘇俄大約供應共匪五十個步兵師的裝備，將近兩千架飛機與近百艘海軍艦艇。

這兩筆收益是從美國得不到的。然而，即使如此，替共匪算算賬，它還是不得不償失的。匪俄偽約實係以美國為假想敵，當時美國對峙的局面已經形成，蘇俄以美國為假想敵，並拉攏共匪為反美的幫兇，在它是合情合理的事。共匪就不同了。美國始時不僅無意與共匪為敵，反在千方百計向共匪示好，希望共匪保守中立，這無異為共匪的對外關係開拓廣闊的途徑。但共匪報以激烈的反美運動，繼以參加韓戰，粗暴的封閉了與美國交往的一切通路，不留絲毫餘地，它捨去坦途不走，却選擇一條極端反美與極端親俄的死胡同。這種選擇使共匪自樹了美國這個強敵，並把自己的安全完全依靠蘇俄的保障，正如很多匪黨黨徒在責詢共匪時所說：共匪選擇的敵人，從未侵佔過中國一寸土地，並曾給中國許多幫助，而它引為靠山的蘇俄，反曾侵略中國廣大領土，拖欠中國不少血債，蘇俄對外關係的紀錄更顯示，它從無誠意履行對他國的條約義務，蘇俄是一個不可靠的盟邦。

不僅如此，共匪的一面倒及參加韓戰，迫使美國改變對華政策

並使自由中國得以在台灣休養生息，復興壯大，成爲共匪的心腹大患。其外，蘇俄的大量軍援，使共匪虧欠蘇俄一百億美元以上的債務，而償還這筆欠債，現已成了共匪的沉重負擔，並更加重其對蘇俄的依存程度。

既是不得不償失，共匪爲何作此選擇？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匪黨是真正的共產黨，決定匪黨大計的，是一羣虔誠的共產黨徒，他們情願爲世界革命的利益忍受若干犧牲；共匪又是靠共產主義的符咒蠱惑民衆，奪得政權，設若中立或親美，等於自行解除其思想武裝，招致偽政權精神基礎的崩解，它不得不爲自身利益向蘇俄低頭，忍受史達林的苛待，而况史達林對它的壓制，並未嚴重到使偽政權無法生存的地步，共匪更自知沒有力量反抗史達林。

史達林死後，匪俄關係進入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至四十八年十月爲止，歷時六年餘，在這一時期，匪俄在較爲平等的基礎上更密切勾結；而另一方面，黑毛間開始發生逐漸劇烈的爭吵，但這些爭吵未影響匪俄的實質關係。

史達林去世後，俄共首腦部爆發熾烈的權力爭奪戰。黑魯曉夫企圖利用蘇俄國內與國際共產陣營對史達林家長統治的強烈不滿情緒，以溫和手段收攬人心，聚集力量，與史達林派一爭雄長，他並想收服毛匪，做他奪取權力的幫手。因之，黑魯曉夫把旅順海軍基地、新疆礦產的開採權、民航公司與大連造船公司的俄方股份等都交還共匪，放棄史達林得自共匪的許多特權（長春鐵路的管理權則是史達林還給共匪的）。與此同時，他更大大增加對共匪的軍經援助。四十三至四十八年，匪俄曾簽訂五次經援協定，蘇俄助匪新建、改建二八六項工業企業，並給以一億三千萬美元的新貸款。蘇俄繼續供應共匪海陸空軍裝備，包括若干新武器，並助匪進行原子研究。在此期間，黑魯曉夫曾經三度訪問北平，向共匪表示友善。黑魯曉夫的懷柔政策換來共匪的臣服與大力支援。共匪曾公開聲明支持黑魯曉夫整肅俄共的史達林派；當波蘭與匈牙利事變後，蘇俄與東歐附庸國的關係呈現裂痕的時候，共匪曾出力調停，使蘇

俄的控制復趨穩定；當國際共黨流行多中心論之際，共匪則倡導共產陣營以俄爲首，維護黑魯曉夫的一元領導地位。共匪對黑魯曉夫王朝的創立與穩固，曾立過很大功勞。

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清算史達林，揭示新路線，藉以開創黑魯曉夫時代。匪黨乃採用史達林模型塑造而成，所謂「毛澤東思想」，不過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毛匪更師承史達林「個人崇拜」的衣鉢，他所負的血債及所犯的過錯，不亞於史達林。故黑魯曉夫鞭屍史達林，在共匪看來，無異於否定「毛澤東思想」，向毛匪的獨裁地位挑戰。因之，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有嚴重分歧，其嚴重性不在對史達林功過的不同評價，而在黑魯曉夫與毛匪的權力衝突。

然而，共匪當時仍在曲意迎合黑魯曉夫的意志，四十五年九月，匪黨第八次大會決定的大政方針，對內標榜開明的專制，對外聲言追隨蘇俄的和平共存政策，都是依循黑魯曉夫路線。匪黨「八大」並刪除「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爲匪黨指導思想的規定，設置「名譽主席」，暗示毛匪無意終身獨攬大權，以沖淡對毛匪的個人崇拜。而在「八大」前後，共匪對內改採寬和政策，甚至發動「鳴放」，較蘇俄走得更遠；對外推行「和平外交」，與狄托建立友好關係，與美國在日內瓦從事大使級談判，並曾作若干讓步。很多人因而推斷共匪已改弦更張，背棄史達林主義。

這種好景如曇花一現，時間十分短暫。從四十六年六月反右派鬥爭開始，共匪內外政策又轉趨激進，其與黑魯曉夫路線間的距離乃日漸遙遠，四十七年七月黑毛第二次會談，已有跡象顯示匪俄間的爭執甚烈，但還能獲致表面協議。待至四十八年十月，黑毛舉行第三次會談，則連表面的協議亦未達成。這次會談沒有發表公報，且在會談以前，匪俄對一些問題已有露骨的爭吵，而在會談結束半年以後，即爆發第一次公開論戰。共匪發表的論戰文字多達數十萬言，策劃及準備這場論戰，也要花費不少時間，共匪可能在黑毛會談不歡而散後，就蓄意挑動這場論戰；其次，這場論戰促使蘇俄對共匪實行經濟制裁。四十八年的匪俄貿易曾創二十億美元的最高紀錄，四十九年起即逐年下降；蘇俄對共匪的經濟與技術援助，也是

從四十九年下半年開始削減。匪俄衝突的激化及其實質關係的日益削弱，其關鍵都在黑毛第三次會談。

三

四十八年黑毛第三次會談是匪俄關係的轉折點。匪俄關係由這一轉折點邁入第三個階段，即急劇惡化的階段。這個階段到現在還沒有終止。

最近三年多來，匪俄間發生過三次大論戰，而且是一次比一次來得激烈。第一次大論戰自四十九年四月至十一月，是由共匪挑起來的。是年四月，共匪報刊假紀念列寧誕生九十週年之名，連續發表四篇專論，批判黑魯曉夫的對外援助進路線，俄共起而反駁，展開舌戰。同年六月，十二國共黨在布加勒斯特舉行會議，協調匪俄爭端，但因雙方爭辯難決，沒有獲得協議，僅決定十一月召開國際共黨大會，再作協商。匪俄雙方在十一月莫斯科共黨大會及其九月、十月的兩次預備會議上，仍有激辯，俄共並控訴共匪從事分裂活動。最後祇好把雙方觀點拚湊在一起，作成一個折衷方案，即莫斯科聲明。共匪有條件的接受這個折衷決議才勉強止息了這場大風波。

這一折衷協議維持不到一年，匪俄論戰再度出現高潮。一九六一年十月在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上，俄共及附和俄共的各國共黨代表們，羣起抨擊支持共匪的阿爾巴尼亞共黨，並用以影射共匪。匪黨列席俄共大會的代表團團長周匪恩來立加反擊，繼以中途退出會議折返北平。嗣後蘇俄與阿爾巴尼亞斷絕邦交，共匪則與阿國簽訂六項經援協定，還以顏色。這一爭執又觸發雙方對外政策的大論戰，參與論戰的有三十多個國家的共黨，大多數支持俄共。這次論戰至五十一年三、四月間始告結束。

五十一年四至九月間，匪俄爭執又呈休戰狀態，雙方在休戰期間曾作幕後商談。但因黑魯曉夫堅持共匪必需改變內外政策，服從莫斯科的領導，並對毛匪壓力，迫其就範，毛匪則堅不降伏，故會談仍無結果。黑魯曉夫對共匪一味頤指氣使，不肯稍加安撫，已够使共匪氣憤的了，而在此前後，蘇俄反與猶太修好，在古巴向美國讓步，對匪印邊境糾紛持中立態度，相形之下，毛匪深感他在克姆林

宮的份量，還不如叛徒、敵人與騎牆份子，乃益增忌恨，刺激其就上述三事猛烈攻擊黑魯曉夫，掀起第三次大論戰。俄共初僅應戰，繼而反撲，指使其附從者接連在保加利亞、義大利、捷克與東德共黨大會上圍剿共匪，對共匪作公開指名攻擊，共匪則有北韓、阿共等為其呐喊助陣。黑魯曉夫更親自參戰，數度露骨譏罵共匪，共匪也立即反唇相向，露骨責斥黑魯曉夫。黑毛衝突乃由暗鬥轉為明爭，並擴延至整個共黨陣營，形成黑毛兩派的對立。而雙方論戰中用語的尖刻，與其辱罵西方敵人的語調相比較，實難分軒輊。

這三次論戰僅觸及對外政策，沒有提到對內政策，事實上在四十七、八年間，雙方對內政策的爭執極其尖銳，後因共匪對內改趨緩進，乃得緩和。這三次論戰都會將匪俄關係帶至決裂的邊緣，然後在懸崖上勒馬止步，退了回來，進行和談。但前兩次的和談都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激起又一次更兇烈的爭吵，從而使現階段的匪俄關係，呈現一張一弛、打打談談的僵持局面。

就匪俄的實質關係觀察，情形亦復如此。蘇俄自四十九年對共匪施用經濟壓力，它非僅對共匪持續數年之久的經濟危機不加援手，更如共匪所述，曾單方面取消幾百件經援協定及合同，大量削減對共匪的經濟與技術援助。四十九年起匪俄貿易逐年銳減，四九年匪俄貿易總額約合十六億四千餘萬美元，五十年劇降至九億一千八百萬美元，五十年估計僅有六、七億美元。與此同時，蘇俄對共匪的軍事援助亦較前減少。不過，俄援祇是減少，並沒有完全停頓。近三年來的匪俄報刊，還間或有一些俄援仍在繼續的消息。本年二月十四日，蘇俄共產青年團真理報刊載一篇北平通訊，透露蘇俄正助匪在長沙建造一所現代化稀有金屬製造與加工工廠，這是去年開始設計的。更重要的是，蘇俄對共匪最感需要的石油產品，即連在匪俄鬥爭派激烈的時時候，依然照常供應，從未中斷。足證蘇俄對共匪的經濟制裁，雖然是步步加重，但仍然留有餘地，他沒有放出停止石油供應的殺手鐗。換言之，蘇俄還不願壓迫共匪過甚，即不願與共匪攤牌。

從將近十四年來匪俄關係的演變中間，可以發現兩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其一是共匪為何由向史達林一面倒，變至向黑魯曉夫諸端挑釁，與它曾經矢志效忠的新家長，展開幾乎是勢難兩立的搏鬥？而這個新家長對待它遠較史達林寬大與溫和。第二個問題是，匪俄爭執的長期僵持局面，顯示它們確有不能調和或極難調和的爭端，這些爭端是什麼，其癥結何在？而匪俄雖有解不開的死結，其衝突比諸昔年俄羅與俄阿衝突有過而無不及，但雙方却能幾度懸崖勒馬，避免攤牌，顯然都不願決裂，又何故如此？

共匪解釋「分歧從何而來」說：問題出在黑魯曉夫迫它服從俄共第二十次大會的路線，而它僅願接受其「積極的一面」，不肯接受其「消極的一面」，並曾陳述所見，要求赫魯曉夫修改這「消極的一面」。但黑魯曉夫堅持共匪要絕對聽命於莫斯科的指揮棒，不准它討價還價，並且粗暴的施用政治與經濟的壓力，勒逼共匪屈服，而罔顧共匪的利益，使共匪不能忍受。俄方指控共匪的罪狀是：共匪違反黑魯曉夫路線，一意孤行，進而公然倡導家庭革命，背叛黑魯曉夫。雙方都承認，爭鬥起自共匪抗不受命，反對莫斯科制定的共同政策，抗拒莫斯科的統一領導。這都是事實。

然而，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裏。如上所述，在偽政權成立的最初十年間，共匪對它的新舊兩位家長都極其恭順，它曾出力將黑魯曉夫扶上寶座，也會不計自身的損害，遵循俄共第二十次大會的新路線，改變對內對外政策，來迎合黑魯曉夫時代。但它後來變了。設若說共匪之變，是由於毛匪久懷貳心，蓄意謀叛，他也應該選擇史達林死後，蘇俄及共產陣營的新指揮中心尚未形成的當口，乘機行事，而不會在抬起黑魯曉夫之後，又當共匪遭遇內部危機，仰賴俄援最殷切的時候，不自量力的魯莽「起義」。職是之故，共匪之變，必定另有隱情。探究這段隱情，前文已提供一個線索：匪俄在四十六年以前還能和衷共濟，到四十八年開始惡化，故問題是在這兩年多內出了一些事情，使雙方關係有劇烈轉變。這兩年多時間發生些什麼事情呢？

先看共匪。四十五年至四十六年春天，因受匈牙利革命的刺激，大陸城鄉社會都爆發一連串小型的反共風潮，使共匪大感震

驚。然而，共匪檢討匈變的教訓，還認為避免重蹈拉科西失敗覆轍的方策，在適當滿足人民的物質福利與合理要求，以寬和方法疏導不滿情緒，容忍「小民主」以免釀成巨變。因之，發動整風與「鳴放」運動。但正如共匪所描述，「鳴放」激起匪黨內外「右派」勢力的「猖狂進攻」，與「反革命份子」的乘機騷動，形成一聲勢浩大的政治風暴。右派公開呼籲澈底變革或再革命，即走狄托的道路或匈牙利的道路，並成立組織，發動示威遊行、罷工、罷課以至武裝暴動。這使共匪體認到黑魯曉夫比較溫和的統治策略，起碼在中國大陸是行不通的。故自四十六年下半年起，共匪不顧黑魯曉夫的反對，將對內政策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它採取比史達林更嚴酷的高壓手段，來鎮壓反抗，這是治標的辦法；治本的辦法是，推行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企圖儘速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共匪的極端左傾政策，幾與黑魯曉夫路線背道而馳，黑魯曉夫對此大為不滿，因而曾嚴加指摘，甚至對西方訪客公開批評共匪「公社」制度的錯誤，使共匪非常難堪。近兩年來，匪俄對內政策之爭，雖因共匪的轉趨緩進而大見緩和，但所造成的裂痕，尤其是心理上的隔閡，仍難消除。

其次，按照共匪的估計，大陸「反革命勢力」與台灣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右派勢力雖然尚未與台灣取得密切合作，但最終亦必歸向台灣，如此將促成國軍反攻與大陸反共革命的裏應外合，這是共匪最懼怕的。因之，共匪亟思解決所謂「台灣問題」。然而，共匪未能從日內瓦美匪談判討得便宜，談判並自四十六年底起一度中斷，共匪誘迫美國撤離台灣的陰謀已成泡影。四十七年八月，共匪發動金馬砲戰，企圖冒險一逞。黑魯曉夫對共匪的軍事冒險非僅未予支持，反加約束，迫使共匪鎩羽而退。一九五九年艾、黑大衛營會談後，黑魯曉夫竟然以調人自居，要共匪與美國先解決次要問題，並對美國作若干讓步，共匪則堅持先解決美國撤退台灣的根本問題，與黑魯曉夫相對，匪俄環繞此一問題的爭執乃益形尖銳化。這一爭端有兩個焦點：對美國態度及對局部戰爭的態度問題，黑魯曉夫恐懼共匪進犯金馬台灣，將導發核子大戰，共匪則不以為然，故於金馬砲戰後高唱「紙老虎論」，以駁斥黑魯曉夫。這兩大問題，即是後來匪俄大

刺激，大陸城鄉社會都爆發一連串小型的反共風潮，使共匪大感震

後高唱「紙老虎論」，以駁斥黑會。這兩大問題，即是後來匪俄大

論的主要爭執點。

再次，右派勢力掀起的反共政治風暴，使共匪覺察匪黨內外的知識階層，已經深受到狄托思想的威染，若不滌除，將成大患。因而中止與狄托的蜜月，發動猛烈的反修正主義鬥爭。然而，黑會則主張，對狄托的鬥爭不能操之過急，以免迫使狄托投入西方的懷抱。直至黑會再度與狄托重拾舊歡，匪南關係則鬧至如藕斷絲連，雙方各走極端，終於撕毀了共匪陣營對狄托有節制的進行黨際鬥爭，但維持普通外交關係的共同政策，狄托問題成為匪俄兩國的一個死結。

四十七年間，西藏的反共革命引發匪印的邊界糾紛，由戰指相罵鬧到揮戈相向，蘇俄責備它不該為一片不毛之地，與尼赫魯翻臉成仇，把一個對匪俄與整個共產陣營有很大幫助的中立集團頭子，推向西方陣營。蘇俄不顧共匪的利益，繼續執行對印度的「友好」政策，甚至當匪印邊境瀕臨戰火之際，蘇俄仍然給印度以經濟及軍事援助，而對共匪沒有稍盡盟約的義務。在共匪看來，這等於援助大家庭的敵人——即使是明天的敵人，與自己的家屬作戰。這是共匪無法忍受的。

在四十七、八年間，正是國際共產運動迭遭頓挫的低潮時期。受波匈事變的刺激，國際共黨的思想論爭復趨激化，若干國家的共黨曾出現退黨潮，共產陣營思想混亂及組織敗壞的現象更見嚴重。蘇俄在太空競賽領先一步，但美國已急起直追，蘇俄的核子戰力仍落後於美國。西歐的政治經濟情勢日益安定，且有顯著進步，黑會的柏林攻擊遭受西方團結一致的堅決抵抗，一籌莫展。中東局勢一度緊張，因英美的堅強得轉危為安，蘇俄則因畏縮喪失先機。納塞的反共態度日漸顯露，兼以匪印糾紛的擴延，顯示共產集團與新興國家間的好景難長，黑會的中立策略可能功敗垂成，其在落後地區之擴張，得力於「毛澤東路線」的有效運用，與黑會的政策無關。毛匪因而對黑會的領導才能深表懷疑，並激起他爭取落後地區領導權的野心。毛匪深信，祇有採用他的辦法，才能在落後地區贏得勝利；反之，落後地區的共產運動應當由北平負責指揮。

毛匪的尾大不掉，犯了黑魯曉夫的大忌。當時正是黑會力謀鞏固匪俄等執的幕前幕後

固國內與國際權力的緊要關頭，他必須保衛作為「黑魯曉夫時代」雜誌的政策路線，制止足以損害他權力地位的任何挑戰。而在那個時候，黑會已有相當強固的力量，打擊敢於抗命的反對者。

比照匪俄理論爭執的雙方論點，其主要分歧點就是以上這些問題。可以斷言，匪俄間的理論鬥爭，是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爭執累積的結果，而具體問題的爭執，又基於雙方的權力傾軋利害衝突。應補充說明的是，毛匪所爭的是部份地區的領導權，他想把落後地區劃為共匪的勢力範圍，而不是想建造以他為中心的共產帝國，他所爭的是次於黑會的第二把交椅，而不是要篡奪黑會的領袖地位。其次，釀成兩國的具體問題，皆屬攸關共匪安危存亡的重大問題，其所以不自量力，敢於以下犯上的原因，即在假如它再事忍讓，將危害到自身的安全。共匪可以犧牲一些國家民族的權益，博取主子的歡心，但它還不至於為了黑會的尊嚴，置自身於危境。換言之，匪俄爭執之所以形成解不開的死結，其癥結在共匪的切身利益，與蘇俄及其所代表的共產陣營整體利益，有了不能調和的矛盾。還要補充一點。黑毛二會的個人因素，也是雙方衝突的重要因素。這兩個共會都是驕橫、衝動而缺乏自制力的野心家，其對形勢的估計及其決策與行動，都常有失誤。就匪俄兩國而言，毛匪顯然對自己的力量估計過高，對黑會的力量估計過低，黑會之對共匪橫施壓力，也是鑄成大錯的過激行動。

五

然則匪俄間既有解不開的死結，何以又幾次從決裂的邊緣退縮下來，不肯拆夥？其答案是：匪俄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一旦決裂，對匪俄及整個共產陣營均有極不利的影響。因此之故，不單匪俄不願「分家」，共產大家庭的其他成員也不讓它們「分家」。所以每當匪俄吵鬧到不得開交的時候，必有若干國家的共黨出面斡旋，國際共黨中無論親黑、親毛或抱持中立態度的，無不希望匪俄息爭，進而消弭歧見，恢復團結。匪俄若不依順輿情，勢將觸犯眾怒，身為「家長」的黑會，對此當更多顧忌。

匪俄既不願分，又無法解開死結，重修舊好，故雙方都想另外

打開一條出路。證諸事實，黑毛之間的戰鬥，雙方皆是採迂迴漸進的策略，其目標不在擺脫相互依存關係，為決裂鋪路，而在壓迫對方屈服，或鬥倒對方，即黑會鬥倒毛匪，或毛匪鬥倒黑會，使匪俄言歸於好。

依據這一有限度目標，其行動準則是軟到不喪失立場，硬到不導致破裂，即有守有節。循此原則，黑毛的鬥爭有三個戰場：（一）黑毛皆致力勾結對方黨內的反對勢力，顛覆對方。這一地下的戰場的搏鬥，不到勝負已見分曉的時候，不會公諸於世，但外界已能嗅出濃烈的火藥氣味；俄共史達林派首要莫洛托夫在偽蒙大使任內與共匪有祕密交往，彭匪懷德在發動反毛事件前曾與黑會在地拉那晤面，去年匪黨十中全會強調防制黨內的顛覆活動，共匪申訴遭受黑會的政治壓力。（二）黑會不斷加重對共匪的經濟壓力，毛匪的實力不足與黑會抗衡，故間歇挑起理論論爭，因擾及打擊黑會。（三）雙方在國際共黨中展開熾烈爭奪戰。據不完全統計，全球九十個共黨中有四十多個支持莫斯科，十多個支持北平。亞洲共黨組織中有了親毛派。

由此可知，匪俄衝突多年來的演變，就其表面現象觀之，固屬五光十色，令人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但究其實質，却是依循一條不能化的軌則。它順着這條軌則而來，今後若無意外的變化，亦將沿着這條軌則而去，直到終點。其終點是黑毛在長距離競賽中有一個力不能支，自承失敗，或是有一個倒了下來。現在很難預測這兩個魔首那一個被打敗，但以目前的實力衡量，黑會較毛匪遠居優勢，他拖垮毛匪的可能性較大。時間似乎是對黑會有利，對毛匪不利。

匪俄既有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故非待一方能擺脫對方的依存，或是感受對方的壓力已使它忍無可忍，難以生存的地步，或所受對方的威脅，較諸來自西方的威脅更嚴重之時，匪俄不致公開決裂。而由於雙方的行動都有節制，避免使對方攤牌，其相互依存的程度又十分深切，至少不是短時間內所能改變，是以除非有意外轉化，上述三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都很少。換句話說，必待有不可測的因素，使匪俄關係的分離力超越其結合力，匪俄才會走向決裂。因而結論是：匪俄決裂的公算極小。

現在再來分析一下即將舉行的匪俄會談，能談出什麼結果。先看一看匪俄兩造的態度。

蘇俄的態度是：（一）主張經由談判根本消除分歧，不同意僅謀求停止論戰，凍結爭端，而根本消除分歧的唯一途徑，在共匪改變立場，接受黑魯曉夫路線，俄共對此決不退讓。並提出恐嚇說：共匪若再不屈服，俄共將加強對共匪的鬥爭。（二）暗示共匪若肯臣伏，俄共可能作下述讓步：放鬆或解除對共匪的經濟壓力，容許共匪對策略的具體運用可自作主張，蘇俄可改善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但至少對兩個引起劇烈爭執的大問題，對狄托及對印度的政策問題，蘇俄非但無任何讓步的暗示，反因其進一步向狄托及尼赫魯表示友善，使匪俄間的距離益趨遙遠。（三）俄共對共匪二月下旬的猛烈攻擊，始終未加還手，黑會與蘇俄報刊一再向共匪傾訴友誼，似在為其建議的兩黨會談，創造有利氣氛。另一方面，俄方仍不斷從正面闡述對各項爭端的立場，偶而也對共匪加以斥責。五月二十三日，黑會在招待卡斯楚的酒會中說：「憑仗核子戰爭建立共產主義的想法，是精神錯亂的胡說八道」，這顯然是對共匪而發。（四）繼續爭取國際共黨的同情與支持，包括爭取傾向共匪的卡斯楚。

共匪的態度比較蘇俄强硬。它與蘇俄一樣堅持自己

蔣總統著

的立場，不肯作原則讓步，

即針對發生爭執的各種實際問題，在其公開言論中也找不出擬作重要讓步的暗示，其唯一建設性的建議，是先能協調的爭端留待從長討論。其次，在以連珠砲轟擊黑會以後，共匪宣佈暫時停

布面精裝定價一九〇元
零售八折機關公函七折

學生教授憑正式公函五折

經售處：正中書局

因而結論是：匪俄決裂的公算極小。

。其次，在以連珠砲轟擊

火，但保留住適當時機，重啟戰端的權利。而即使在共匪承諾的停火期間，它也沒有停止施放冷箭，它與蘇俄一樣，也會突然向對方扔一個炸彈。劉匪少奇最近在河內的激烈演說，即其顯例。復次，共匪與蘇俄同樣積極的在國際共黨中爭取與軍，北越及印尼共黨已更靠近共匪。

比較匪俄雙方態度的綜合印象是：黑毛都是用兩面手法來肆應這場鬥爭。雙方都宣佈暫時休戰，但祇是改變戰鬥的方式，並沒有真正停止戰鬥，雙方都聲言願意和解，但其立場如南轔北轍，根本無法接近，似乎缺乏謀求妥協的充分誠意。兼以兩黨會談在籌商期間波折發生，黑毛都不願接受對方的邀請舉行高層會議，率領匪黨代表團參與談判的鄧小平、彭真二酋，又是反黑的兩員健將，他兩曾在布加勒斯科會議與第二次莫斯科會議上，表演過全武行。由此可知，匪俄歧見難望消除，黑毛亦無良策使對手繳械歸降，此次會談無法使匪俄捐棄前嫌，和好如初。但另一面情況則顯示，匪俄雖

有鬥爭，惟還望聯合，故皆盡力忍讓，四月間簽訂的匪俄本年度貿易協定，蘇俄依舊以石油產品供應共匪，此次會談也不可能導致匪俄的最後決裂。易言之，此次會談不足改變既定的軌則，匪俄爭執在今後一個相當時間內，仍將維持一張一弛的僵持局面。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匪俄理論爭執是由很多實際問題的衝突

累積而成，這些實際問題有大有小，所引起的紛爭有輕有重，大的嚴重的不能解決，小的輕的却可望和解，何況共匪已有先協商次要爭端的建議，蘇俄對若干可以讓步之處也有所暗示，雙方就一些爭端覓致協調，並非全無可能。這種協調雖不會改變匪俄間的僵持局面，但可能帶來暫時的妥協或較長時間的休戰。

匪俄爭執既深且廣，在一次會談中勢難充分交換意見，故七月間的會談，可能是一連串談判的開端，包括黑毛高層會議及國際共黨會議，而黑毛高層會議與國際共黨會之能否召開，將是測驗七月會談有無成就的主要試金石。



由自由世界來看，亞洲共黨之無論倒向匪俄任何一方，其為禍源則是同樣的。如果想「以匪制俄」或「以俄制匪」的幻覺從事反共工作，那將是助長禍源的做法。

張棟材

一 前 言

護團結」和「萬古常青的友誼」等等口號了；雙方不僅是相互冷嘲熱諷，而且是已到了彼此漫罵得毫不留餘步的程度了。在這一段過程中，匪俄都通過所有可資利用的宣傳場所與工具來公佈其嚴厲指責對方的言論，他們的企圖是相同的，那就是為了要達成下列兩項目的：

（一）使其發生號召力，用以爭取共黨政權國家及世界各國共黨之支持而為己方效命；（二）使其發生制裁力，用以打擊對方弱點而削

弱其聲望，造成有利於己方的形勢。

共匪在上述兩項目的上所獲致的結果，若就目前情況而言，顯然是居於下風的，匪「人民日報」於三月廿一日即供稱，在過去五個月來，世界上就有四十四個共產黨連續不斷地攻擊共匪，並加以各種罪名，例如：「教條主義」、「左傾社會主義」、「冒險主義」、「托派」、「民族主義」、「宗派主義」、「好戰」、「侵略」、「反對和平共存」、「反對各種談判」、「主張國家之間打仗以便促進社會主義」、「採取觸發熱核子戰爭的政策」等等，凡是共黨內部整肅所能套用的術語，可以說是一應俱全。

共匪自己也承認它在國際共黨陣營是居於「少數地位」；不過共匪對此却抱有另一種詭辯與幻想，它叫囂着：「誰代表真理，並不是可以按照一時的多數或少數來判斷的。真理是客觀的存在。」一時的多數，終究不能把錯誤變成真理；一時的少數，也終究不會使真理變成錯誤。」「一切敢於堅持真理的人，絕對不會害怕自己暫時處於少數地位。」「世界上唯一的最可靠的多數，那就是決定歷史命運的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那些違背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人們，儘管在某個地方、某個會場上，可以吵吵嚷嚷、喧囂一時，但是他們決不代表真正的多數。他們所攻擊的少數，實際上恰恰是多數。」（以上見匪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這些話極能說明共匪在對抗俄共的鬥爭中，充滿了過剩的自信力而不肯輕易對俄妥協的頑強心情。因而共匪會一再要求召開國際共黨會議來幻想它能藉此改變其所居「少數地位」的頹局。

共匪對自由世界常常以假冒中國六億五千萬人民的龐大人口數字來施行威嚇，這次在對抗俄共的手段上，也抬出了所謂只有全世界的人民是最可靠的多數的一套，這裏面是有原因的：目前國際共黨共有九十個，黨員合計四千二百五十萬人（見本年四月十日俄「真理報」），如果僅就黨員人數來計算的話，則共匪即擁有一千七百萬名，連同傾向於匪黨的北韓、北越、阿爾巴尼亞、印尼、新西蘭、日本……等共黨黨員，就可超過國際共黨黨員總數的過半數。共匪

認為它以反美、反帝、反大國沙文主義、反現代修正主義等煽動政策，在亞、非、拉丁美洲落後地區絕對能夠取得支持，所以它便又敢於進一步地以假冒全世界的人民來對俄共施行威嚇了。關乎這一點，俄共在其同意與匪舉行雙邊會談並指定時間地點，於三月三十一日給共匪的長信中，已特別提出很露骨的警告，嚴詞斥責共匪圖以民族主義、有色人種及地理原則來迷惑落後地區共黨的做法，是只能帶來「損害」與「拆散」的行為。現在匪俄雖均已決定由二級角色進行雙邊會談，但距共匪所希冀的國際共黨會議，却是遙遠而渺茫的。同時，俄共僅僅同意雙邊會談且含有拖延意味，也正是針對共匪圖挾落後地區共黨以頹頹俄共的一種抵制方式，它並不是雙方將趨向和解的象徵。

今日國際共黨都面臨着的一個問題是：在匪俄對立衝突中究將同情於何方及選擇何方靠攏？這在歐美工業國家的共黨來說，幾乎是全部都傾向於莫斯科，並都一一展開了對共匪的攻擊；剩下來的亞非、拉丁美洲所謂落後地區共黨，則正在演着一場匪俄雙方的爭奪戰。本文茲先就亞洲共黨的動向作一研析，來觀測共匪究竟有無與俄分庭抗禮的實力。

二 亞洲各共黨最近所表示的態度

北韓是亞洲共黨中唯一挺身公開表示支持共匪的，它在本年一月中旬東德共黨大會內——當着從世界七十個國家派來的四千五百名代表面前，事實上又有黑魯曉夫親自參加，等於是俄共操縱下的第一次世界共黨圍攻共匪大會——充分地表明了它的這種鮮明態度，韓共代表會反駁蘇俄及東歐附庸指責共匪的言論，強調了共匪在共產陣營中的重要地位。

韓共有黨員約一百三十萬人，其首領金日成和共匪具有組織上的血緣關係，前年七月間當金日成為與匪簽訂軍事同盟條約作第四次訪匪之行時，共匪會介紹金之生平謂渠自幼年即隨家遷居中國東北，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一年加入「共產黨」，這顯然在說明金還是「中國共產黨」出身。其與蘇俄之關係

僅指其係「依靠」蘇軍佔領北韓後而歸國，而北韓共黨之成立，尚在其歸國兩個月之後，更可見北韓共黨有共匪孕育成分。金和毛匪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都不肯附和黑魯曉夫反史達林運動，並且相反地死抱着史魔骸骨來作鞏固個人專斷獨裁的護符，這是促進北韓毅然採取投向共匪的主要原因。韓共追隨共匪對俄抗衡的行動顯著的表現在下列數點：○照常懸掛史達林肖像並保留史之銅像；○杯葛蘇俄迫使各附庸實行生產專業化之經濟互助委員會；○支持共匪反對蘇俄親南斯拉夫政策及黑魯曉夫修正主義之鬥爭；○支持共匪對古巴事件批判黑退却之立場；○凡屬共匪所發表醜詆蘇俄的文件，韓共報紙均予全文轉載。

偽蒙共黨有黨員約四萬四千人，它和蘇俄的主奴關係，由於偽蒙完全為俄侵華政策下導演而成的原故，其色彩最為濃厚。因是，偽蒙會澤登巴爾之一切唯黑會之命是從，乃是可以想見的。但共匪對偽蒙的無償經援，則亦極盡積極之能事，如從一九五六年到現在付與偽蒙去年底正當匪俄論戰激烈的時候，共匪突然邀澤登巴爾赴匪區並勿與其簽訂了偽邊界條約。顯然，共匪是想在經援收買之外，又在邊界土地上作了重大讓步，企圖籠絡到偽蒙在匪俄衝突中對它的支持。

可是，共匪的此項企圖，後來證明是大大的失敗了。澤登巴爾不僅是在匪區內讚美黑魯曉夫所主張的共黨陣營計劃經濟的國際分工和對古巴事件的處理，而在本年元月初旬蒙共思想工作問題會議中，並在俄共中委會書記伊里切夫的監臨下，更對共匪大肆抨擊了澤登巴爾將共匪所支持的阿爾巴尼亞罵為「粗野的叛徒」；將共匪的「行動」罵為「不正確的和極端有害的」「不負責任的」和「妄自尊大」，且影射共匪即為「教條主義者和左翼機會主義者」，指其「已成為國際共黨運動的最危險因素，會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

北越共黨有黨員約五十萬人，年逾七十的黨首胡志明，現在已是亞洲共黨圈內個人與列寧相識的僅有少數人中之一人了。憑着它的年齡、黨齡和聲望以及過去與匪俄雙方的歷史關係，使它成為具

備調解匪俄衝突資格的最適任者，在共匪於本年三月九日所公佈給俄共的函件中，也證明了胡確是從中最初擔任調停的人。

胡志明一向是較為持重冷靜的，它對待匪俄始終都在竭力保持著觀望中立的立場，它對匪俄雙方也都有期待於經軍援的依存性，故其最高目標便在力謀儘一切可能從匪俄雙方得到更多的更長期的援助。越共對反史、反阿都避免論及，一方面聲稱努力於尊俄為首的共產陣營的團結；另一方面亦表示與共匪同調的反現代修正主義，對匪俄雙方都在作面子上的敷衍功夫。

北越對匪俄關係最近所表示的一次態度，是本年五月十六日，當匪酋劉少奇訪問北越完畢時，胡志明和劉匪簽署的一個長篇文件——聯合聲明。在這篇聲明內的若干語句，如過分讚譽共匪「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的作用；堅持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宣言與聲明所明確規定的「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相互關係準則」；渲染反對修正主義並指「南斯拉夫背叛了馬列主義而脫離了社會主義陣營」……這些純共匪式口吻的濫調，現由胡志明出名同意，自是越共稍稍在中立立場上偏於共匪的一個信號，尤其是正當黑魯曉夫即將應狄托之邀往訪南國之前，此種公然反南態度，不能不說是胡志明存心打擊黑會的重大決定。

印尼共黨有黨員約二百萬人，且尚擁有外圍的同路人社團號稱達數百萬人，它是今日非共國家內黨員人數最多的一個共產黨，它的羣衆力量實足以凌駕蘇卡諾所領導執政的國民黨，且在印尼國內經濟惡化之背景下，它的勢力尚正在逐漸增大之中，黨首艾地之受匪俄雙方重視，其故即在於此。俄國防部馬林諾夫斯基、匪僞主席劉匪少奇，於本年三、四月間先後至印尼作訪問活動，無疑的，都含有爭取的意味。

印尼共黨對匪俄衝突，在表面上也是採取了類似越共的中立立場，但在緊要關頭的表現，却都是追隨了共匪，例如它從不依照黑魯曉夫路線去推動反史運動與反阿批判；主張各共黨絕對獨立平等，不能接受其他共黨命令；艾地會一再指稱在一個黨代表大會上攻擊其他「兄弟黨」為「製造一種惡劣先例」，而該項惡例不斷重演的結果，則「留下了共產主義大家庭破裂的印象」，這已等於

爲阿共及共匪辯護而向黑會提出了正面的譴責。其他如對反南問題，在去年十二月初旬捷共大會中會公開抨擊南修正主義；對古巴事件與匪印邊界衝突問題，印尼共黨也都作了支持共匪片面意見的呼應。

日本共產黨有黨員約九萬人，黨首野坂參三於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曾由俄潛赴延安與毛匪合作，此一歷史關係使日共與共匪的勾結加深，而在日共內部也因之產生了親匪派與親俄派的權力鬥爭。

總書記宮本顯治，被目爲親俄派的首領。

日共對匪俄衝突，從最初便抱着對外否認，對內嚴禁討論的曖昧處理態度，它在匪俄兩大黨的夾縫中，只希望能運用向雙方取寵的巧妙手段，作長期間地等待時間來解決問題，本年二月中旬日共五中全會決議，即強調此點。

日共的機關報「赤旗」，對匪俄雙方抨擊文件，均擇一同日與同一大小篇幅刊登，並不附註任何意見；國際共黨理論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自去年十一月份起即刊登以批判阿爾巴尼亞形式直接抨擊共匪之文章，日共爲求不開罪於共匪起見，乃將該雜誌之日文版重加編輯，凡有關抨擊共匪意味之文章一律予以刪除，這些都可反映出日共的含糊態度。但在反南修正主義問題上，日共則明確地表示了與共匪同夥的立場。

一九六一年夏，日共中委春日庄次郎等七人脫黨時曾責難日共在重要問題均聽命於共匪；本年三月初間又有前中委波多及佐賀縣副委員長成富等六人脫黨，在他們所發表的聲明中，亦一致暴露日共支持共匪好戰路線而壓迫內部黨員自由討論之事實，由此不難想見日共內親匪派勢力是在增強着發展的。

印度共產黨有黨員約二十五萬餘人，黨首丹吉於去年十月間匪印武裝衝突後，曾以代表尼赫魯之非正式特使身份，兩度赴俄向黑魯曉夫求援；更在印共機關報雜誌「新時代」發表責難共匪侵略印度之論文；十一月一日印共於新德里召開緊急會議時，並通過了丹吉所提出的反對共匪侵印的決議。印共依附俄共而與共匪站在相敵對的地位，在匪俄互爭亞洲共黨的角逐中，給亞洲共黨，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共黨增加了若干困惑。

就是在印共內部，也免不了那種困惑。如總書記南布迪里巴德即不贊成以共匪爲敵，故亦未在反對共匪侵印的決議上簽字。因此乃造成印共的內鬭，結果是南布迪里巴德被免去總書記職務，改任爲書記。國際間曾盛傳印共中有親匪派，並在西孟加拉省成立組織，此一可能雖有，但在印舉國反匪浪潮澎湃下，它的活動最多只能潛入地下，不會有什麼聲勢出現。

以上是亞洲已取得政權的共黨和在非共國家內已有相當實力與發言權的共黨，在匪俄衝突中所表態度的一個概括輪廓。至於其他的小規模共黨羣，它們都正在自顧不暇，對匪俄關係問題還够不上發言的資格，縱然有所表示，也不會受人重視。這其中，寮共是較爲引人注意的一個目標，但它是寄生在匪俄及北越三方面的支援之中，它不能有自主的意見。柬埔寨共黨情形類此，惟實力微不足道。緬甸共黨則是一向混亂地有紅、白旗之分，紅旗共黨份子是既反黑會，亦反毛匪；白旗共黨份子於去年底組成了「統一勞動黨」，對匪俄是表面上雖雙方稱臣，却對共匪格外恭順。只有錫蘭共黨在反史、反阿運動上，做得非常澈底，其效忠黑魯曉夫之程度，甚至被認爲超過其他附庸國。此外，再如泰國共黨、馬來亞共黨以及北婆羅洲、婆羅乃、沙撈越等地區零星共黨，則多爲醉心於共匪型武裝叛亂行動的狂熱份子，而且大都出身於華僑社會。一般地說來，共匪對它們的支配影響力可能大於俄共，這也是該地區許多被逮捕的共黨指導份子們所供述的一項事實。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將亞洲各共黨對匪俄之態度與性格，分列爲以下類型：

完全投向於蘇俄者：僞蒙、印度、錫蘭。
公開投向於共匪者：北韓。
中立觀望但部份支持共匪者：北越、印尼、日本、緬甸。
受共匪影響力強而有投向共匪之可能者：寮國、柬埔寨、泰國、尼泊爾、馬來亞。

三 亞洲各共黨之共通心理與意圖

匪俄對亞洲共黨的爭奪戰，現尚處於勝負未分之局。但形勢與共匪有利，則可由下述有關亞洲共黨所持立場之特徵顯現出來：

一、絕大多數共黨對莫斯科唆使反史、批判阿共、孤立共匪的意向，都堅持其獨自見解，不肯輕易策應黑會路線。它們以強調團結為逃避的口實，且動輒提出莫斯科會議宣言與聲明的兩個文件為團結指標；實質上是幫了共匪的忙。

二、絕大多數共黨對莫斯科與南斯拉夫重歸於好一事，都公然反對並揭起「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鬥爭」的旗幟，此點最能符合共匪推動反黑會運動的要求，蓋共匪自去年九月起以迄目前以發表反南反黑文件，無一不在儼然自稱北平為「保衛馬列主義純潔性」之中心。

三、絕大多數共黨對共匪所提召開國際共黨會議以解決意見分歧的建議，都遠在黑會表明態度之前表示贊成。黑會最初對此不屑理會，但終於本年元月中旬在東德共黨大會中也作了同意的回答，其後乃有匪俄雙邊會談之交涉。此無異於間接證明亞洲共黨在無形中對俄共起着壓力作用。

形成亞洲共黨該項特徵的最大原因，是由於它們基於本身環境利害，對匪俄衝突具有先行考慮，本身得失的共通心理與意圖，故由此點論，表面上雖形勢有利於共匪，實際上並非共匪所能利用的助力。

第一、它們把匪俄視為對等的雙重的依存母體，因為亞洲各國共黨都不是就地自生長大的，都是來自匪俄的強制製造，它們必須接受兩個母體的滋育——亦即是匪俄雙方的戰略戰術指導與金錢物質援助才能發展；因之，它們的最大意圖便是得到雙方的接濟與愛護，有時看來似乎稍稍偏向於一方來反抗另一方，這只是一種爲了滿足上述意圖的「鬧情緒」方式。

第二、它們對匪俄衝突勿寧說是內心竊喜的，因爲兩個母體都要爭取它們，這使它們獲得身價提高與受管制鬆弛了的解放感。共匪利用落後地區共黨心理所煽動的反黑反俄共口號如「反大國沙文主義」、「不能把一個黨的綱領、決議、方針、政策強加於其他兄弟黨」、「黨無大小高下之分，一律平等」……等，最能符合亞洲

各共黨的苦悶要求，是以它們都暗認爲由此反而可以藉共匪之反俄而爲自身未來不受雙方控制計，乘勢創造導向獨立自主的條件。

四 結 語

現匪俄由二級角色出面的雙邊會談，匪方代表團爲鄧小平、彭真兩匪；俄方代表團爲蘇斯洛夫、伊里切夫等，已定於七月五日在莫斯科舉行。此種會談縱可使雙方暫息爭端，但雙方的基本立場均難有讓步可能，會談並解決不了問題，乃是一個必然結局。因此，匪俄衝突仍將爲一長期對峙的僵持化。

根據上述亞洲共黨態勢及其共通的心理與意圖，我們可以想像到它們是樂於看到這種匪俄衝突之長期僵持化的。印尼共黨主席艾地曾經這樣說過：「舉行全世界各個共產黨的會議，事先應當用譬如一、兩年的時間來做好充份準備。」（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艾地在印尼共黨於雅加達市舉行之一集會中的講話）日共也曾說過：「中蘇應在理論與政策的歧見上，通過無比的容忍努力和時間來求取解決。」（見來年二月日共五中全會決議文）這都可反映出它們並不急於期待匪俄早趨和好的心情。

亞洲共產如北韓之投向共匪；以及部份響應共匪反南如北越、印尼、日本等共黨，今天尙不能將其遽以看做已與共匪合流爲對抗莫斯科的集團。亞洲共黨並未無視客觀事實，它們仍然承認俄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與中心，尤其對蘇俄現代工業科學軍事之進步强大更要看作爲生存的背景，而共匪在這方面却是無能爲力的。今天的共匪已處於內外煎迫的崩潰前夕，但共匪却不敢正視其自身的危機，竟夜郎自大地妄圖假「馬列主義純潔性」的符咒來裹脣亞洲共黨與莫斯科爭奪領導權，這是一種自我陶醉的夢想，也是無謀的最後掙扎。亞洲共黨對共匪的附和，只能算是對莫斯科的姿態，只要莫斯科稍加安撫，就可使其就範。所以就俄共方面來說，它對共匪挑撥亞共反黑反俄，實並無所畏懼的。

由自由世界來看，亞洲共黨之無論倒向匪俄任何一方，其爲禍源則是同樣的。如果想「以匪制俄」或「以俄制匪」的幻覺從事反共工作，那將是助長禍源的做法。

菲律賓國會的政治風采

吳春熙

一 菲律賓的國會

菲律賓立法機關屬於國會，國會由參議院（Senate）與衆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組成之，兩院組織如下。

(1) 參議院 參議院由參議員二十四人組成之，任期六年，自當選後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起算，其資格須為菲出生之公民，年滿三十五歲，享有選舉權者，并在選舉前須居住於菲律賓兩年以上。一九四一年首屆當選參議員分為三組，每組八人，第一組任期六年，第二組任期四年，第三組任期二年，以後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佔領菲島，致使一九四三年及一九四五年均不能舉辦改選。日本投降後，第二第三兩組議員任期均已逾期。一九四六年一次改選參議員十六名，并規定得票最多數的前八名任期六年，次多數的任期為四年，一九四七年第一組議員任滿改選，自一九四九年以後，每六年改選三分之一計八名。本年十一月又屆改選年度。

(1) 衆議院 衆議院由衆議員一百二十人組成之，其人數按各省所代表之人口比例分配之，但每省至少應選出議員一人，國會於每次人口調查後三年內以法律變更選舉區之議員分配額，現有衆議員僅一百零四人。衆議員任期為四年，自當選後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起算，其資格須為在菲出生之公民，年滿二十五歲，享有選舉權者，并在當選之省區內居住一年以上。

參衆兩院議員遇有缺額時，得依法舉行特別選舉，以補足所缺

之名額，但補選之議員任期至出缺者之原任期屆滿時為止。兩院議員均由國家給予年俸及自選區至國會出席會議之往返旅費。依憲法規定在會議中或出席會議之途中，除犯叛逆罪、重罪及破壞和平罪外，不得加以逮捕，國會議員在議會中所發表之言論或辯論，不得於他處質問之。同時亦規定議員未辭去其議席，不得兼任政府官職，或與政府機關發生任何經濟上之契約關係，并不得任選舉法庭辯護人或與政府機關有關之對造當事人的辯護人。

參衆兩院，每年於一月份第四星期一召開常會一次，會期規定除星期日外，不得超過一百日，菲律賓習慣上稱國會常會謂「百日國會」，但憲法規定總統因討論一般或特定之立法提案，得隨時召開特別會議，其會期不得超過三十日。

參衆兩院各選出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多數黨推選其黨內議員一人為議場多數黨領袖（Majority Floor Leader），主持議程的安排，兩院均設置各種常設委員會，其召集人向由多數黨內部協議分配。議案先送委員會審查後，提出大會討論，有關撥款、稅收及增加公債之財政法案及地方性或私人提案，均須由衆議院討論，但參議院得提出同意或修正。議案提付表決時，兩院均以過半數之多數為表決之法定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時，兩院得暫時宣告休會，但在會期中未經他院之同意，不得休會至三日以上，亦不得在兩院所在地以外之地點開會。必要時得強制缺席之議員出席。議員不守紀律得經議員全體三分之二之同意停止其出席會議，例如上屆國會衆議員小奧斯敏那（Osmena Jr.）即受衆院停止出席會議十五個月的

，並在當選之省區內居住一年以上。

參衆兩院議員遇有缺額時，得依法舉行特別選舉，以補足所缺

紀律得經議員全體三分之二之同意停止其出席會議，例如上屆國會衆議員小奧斯敏那(Osmena, Jr.)即受衆院停止出席會議十五個月的

處分。

法案經國會通過，成爲法律前應咨送總統，總統認可時加以簽署，否則應將反對意見交還提案之議院覆議。覆議時，如經該院議員三分之二之同意通過原案，應將法案連同反對意見，送交另一院再加覆議，如經該院三分之二同意通過該法案即成爲法律。總統收到兩院通過之法案，如不於送達二十日內退還或交付覆議時，該法案視同已加簽署而成爲法律，但遇國會休會不能及時交還，該法案除總統於休會後三十日內加以否決外，亦成爲法律。

參衆兩院各設選舉法庭，以審判關於議員之選舉糾紛，法庭由九人組成之，其中三人由最高法院院長指定最高法院法官充任之，其餘六人由議員充任，其中多數黨提名三人，次多數黨提名三人，庭長由資深之法官充任之。

國會設任用委員會(Commission on Appointment)，依據兩院各政黨之代表比例，而由參衆兩院各選出議員十二人組成之，參議院議長(President)任該委員會主席，可否同數時主席無表決權，任用委員會應於國會會期中集會，由主席或多數委員會之請求召集之。任用委員會係國會控制總統人事行政之組織，往往成爲行政權與立法權衝突的主要焦點，在奧斯敏那總統與季里諾總統任內，因反對黨控制國會，總統任用官吏，深受困擾。因此在任用官員時，往往須事先徵詢任用委員會之意見，採取類似美國國會所謂「對參議員禮貌」(Senatorial Courtesy)，以避免被國會擋置。本屆國會馬嘉柏臬總統正受同樣的困擾。

菲律賓國會參衆兩院的權力與美國國會情形大致相同，但非參議院沒有單獨批准官吏任用權。衆議院議員人數較多，派系政爭比較容易控制，故議長地位較參議院議長爲穩固；參議員因係全國普選產生，聲望比較崇高，其個人的政治影響力亦較大，一般言之，衆議員大都代表地方利益，參議員則代表政黨的政治利益，歷屆總統都出身參議員，因此民衆視參議員的地位爲當選總統的踏腳石，戰後菲律賓十四位總統候選人中，即有八位擔任參議員，戰後五位總統祇有麥格塞塞(R. Magsaysay)和現任總統馬嘉柏臬非參議員出身，因此參議員的競選一向激烈。

菲律賓國會的政治風暴

一、本年「百日國會」的風暴

(一) 國會兩黨議席的變遷

菲律賓重要的政黨爲自由黨(Liberals)與國民黨(Nationalists)，此外尚有公民黨(National Citizens Party)等少數黨派。戰後歷經羅哈斯(Roxas)、賈西亞(Garcia)及現任馬嘉柏臬(Macapagal)五屆總統選舉，均由自由黨與國民黨輪流交替執政，一九四六及一九四九年兩屆屬自由黨；一九五三及一九五七年兩屆屬國民黨，一九六一年大選，自由黨重握政權；但在國會中，兩黨議席的消長，則頗多變遷。

第四屆國會(一九五七——一九六一)，衆議院國民黨佔八席，自由黨僅二席，一爲公民黨，一爲無黨派。參議院國民黨佔十五席，自由黨僅五席，進步黨(Progressive)一席，餘三席係無黨派。迨至一九六一年大選，自由黨的馬嘉柏臬當選總統，但國會議員選舉結果，衆議院一百零四席中，國民黨仍佔六十七席。自由黨雖爲執政黨；但在衆院則爲少數黨。參議院改選八名議員，選舉結果，國民黨只得二席，自由黨雖則獲得六席，連同原有議席亦僅十一席，國民黨仍然以十三席多數控參議院，形成自由黨執政，國民黨控制兩院的局面。

第五屆國會第一次百日常會(一九六二年春)，兩黨形勢發生急劇變化：

(一) 衆議院——國民黨因內部分裂，一部份國民黨籍的衆議員集體脫黨，加入自由黨，轉瞬間自由黨成爲衆院多數黨，順利選出維拉勒爾(Cornelio T. Villareal)爲衆議院議長(Speaker)，彭大東爲副議長，推選文旦諾爲多數黨議場領袖(Majority Floor Leader)。國民黨僅保有四十一席。

(1) 參議院——因國民黨籍參議員描佬(Eulogio Balas)跳槽加入自由黨，在參院遂形成自由黨與國民黨各擁有一席的局面，頹頹經年，議長(President)無

法產生，迨至本年第一次百日常會因國民黨籍參議員亞敏都拉斯（Aljandrio Almendras）在選舉議長時支持自由黨的馬戈斯（Ferdinand E. Marcos），始打開僵局。

菲律賓政黨組織，並不十分嚴密，各黨每一年召開代表大會一次，提名總統及議員候選人，出席代表派系複雜，往往須於幕後洽商，顧及各區利益及派系集團力量，因此選出之議員其政治立場極不穩固，往往因政治利益，隨時彼此結託，現在自由黨議員中包括大同盟（Alliance）和一部份原屬國民黨黨員，國民黨參議員中的陳迎達（Lovenzo Tanada）係公民黨。

(I) 自由黨控制下的衆議院

自由黨在衆議院雖然擁有多數的議席，但其構成的份子並不單純，其中部份衆議員係新加入的自由黨員，且在衆院佔據優越的權位，如副議長彭大東，撥款委員會主席方危爾，外交委員會主席藍藍摩斯均係新自由黨員，因此與衆議院原有老自由黨員彼此間不無芥蒂。

今年會期中自由黨原可控制衆院，不致有何風波，因政府提出土地改革案，此案與衆議員平時所代表的經濟集團利益不無直接衝突，自然為一般議員所畏懼。在會議進行中，衆院多數黨議場領袖文旦諾安排議程激起議員反感，兩黨衆議員藉口拒絕出席會議，致使會議連續休會三天。依照規定，出席議員未達半數，不得開議，若干重要法案均無法完成立法程序，迫使衆院議長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下令看管在場議員，一面派國會警察追捕缺席議員。關於土地改革草案及重要法案，國民黨前衆議長小劉禮（Laurel）曾向總統保證與政府充分合作，但必須請總統撤換多數黨議場領袖，以平衆憤。此事顯然予馬嘉柏深感困惱，在馬氏處境認為如掉換文旦諾職位，此例一開，老自由黨員勢必乘機而起驅逐新自由黨員在衆院其他職位，而引起自由黨內部的爭執，經過幕後的協調，衆院終於在會期內將重要法案，一一予以通過。事實上國民黨在衆院勢力單薄，顯然無法掀起軒然大波。

比較為社會所注目的事是國民黨衆議員賈芒拉（Bartolome Cabangbang）在衆院特權演說中公開指控馬嘉柏梟案，賈氏指出：（一）總統於史東希爾（Havergal Stonehill）遭配出境前，在前財政部長詩遜（Fernando Sison）寓內與史氏會晤，（二）總統之弟安琪（Angel Macapagal）在麻拉開私營賭窟，（三）總統利用親信營建私宅，（四）總統之女西諾（Mrs. Cielo Salgado）利用國際機場貴賓室從事非法致富活動，（五）史東希爾之妻攜帶皮箱出入總統府。賈氏此一爆炸性的指控，已由衆院組織十五人委員會會同國防安全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與政府特權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l Government and Privileges）進行調查。自由黨衆議員素洛哥（Florino Crisologo）同時指控賈芒拉衆議員：（一）與當年麥格塞塞墮機罹難案有關；（二）有協助圖謀暗殺馬嘉柏梟總統的嫌疑。現在此案國防情報機關已進行蒐集證據。準備對賈議員採取行動，國民黨領袖亦正集會討論制止軍部於國會閉幕逮捕賈氏。衆議員賈芒拉案十五人委員會已向衆議院建議時將賈氏停職十五個月。將來是否會如同當年國民黨在衆院制裁小奧斯敏議員，抑或變成一件刑事案件，現在尚在發展中。

(II) 國民黨控制參議院

菲國會中重要職位，除議長、副議長、多數黨議場領袖外，設置各常設委員會，任何議案須依其性質先行分發至各委員會審查後，再提出大會討論，但委員會不常開會，兩院重要決定都集中於多數黨的政黨會議。政黨會議通常在國會大廈外非正式舉行，由兩院議長擔任主席，其領導權具有權威性，因此議長之爭不但為兩院所重視，即在各政黨內部亦視同全黨領導權的爭取。菲律賓歷經五屆國會，通常參議院議長同時即為多數黨的主席，此一傳統假如能够確立，則參議院即可鞏固其領導地位，惟事實上往往因兩黨內部派系之爭，參議院議長之選舉時常發生困難。一九五二年國會常會，會期已逾四分之一，議長仍無法選出，本年參院議長選舉亦遭遇同樣困擾。

期內將重要法案，一予以通過。事實上國民黨在衆院勢力單薄，顯然無法掀起軒然大波。

樣困擾。

本屆國會第一次百日常會召開時，國民黨係多數黨，選出羅里藝術（Eulogio Rodriguez）為參議院議長，洛熙示（Fernando Lopez）為副議長，彭美舍斯（Cipriano Princípia）為多數黨議場領袖，參院十二個常設委員會主席亦均由國民黨議員擔任。嗣因國民黨籍參議員描佬（Eulogio Balao）加入自由黨，遂形成參院兩黨各十二席的對峙局面。本年召開第二次百日常會，議長改選始終僵局，自由黨方面一致支持馬戈斯（Ferdinand E. Marcos），國民黨方面因孫武朗（Lorenzo Sumulong）和阿敏都拉斯（Alejandro Almendras）反對羅里藝術，雖經黨內協調改推洛熙示出任議長，亦未能獲得阿敏都拉斯之同意，於四月初投票選舉議長時，支持馬戈斯，自由黨始能以十三票對十一票當選參院議長。

馬戈斯當選議長後，如不能改選參院其他重要職位，仍然無法完全控制參院，自由黨會要求改選副議長，提出菲蘭禮斯（Eustaquio A. Fernandez）代替國民黨的洛熙示，同時推選巴里惹（Ambrosio Padilla）代替彭美舍斯的多數黨議場領袖。而更重要的是改選國會任用委員會，參議院議長為當然的任用委員會主席，自由黨的策略認為只要改選副議長成功，不但任用委員會可以控制，其他十二個常設委員會的改選當亦有可能。自由黨如若不能爭得這些重要職位，單憑獲得參院議長職位，仍然要受國民黨的阻撓，所有重要提案和官員任免勢難如期完成立法程序。自由黨的計劃能否成功有一個必須的條件，即是能否獲得國民黨籍議員阿敏都拉斯的再度支持，但阿氏曾經數度聲明，他支持馬戈斯目的在撤換羅里藝術，至於參院其他職位則主張維持現狀。因此當自由黨提出改選副議長時，阿敏都拉斯請假不出席，使任何投票都無法超過半數，而國民黨方面爲了等候阿敏都拉斯表明態度，不得不採取拖延時間的戰術，在參議院實施拖延演講。由於國民黨控制參院，實行阻撓手段凍結重要議案，馬嘉柏臬總統曾經一再呼籲，促請國民黨參議員與政府合作，但並未發生多大效力，甚至在參議院掀起更大的政治風暴。

按照規定百日常會應於五月二十三日午夜閉幕，但慣常如議案未及通過，可將時鐘指針暫時固定於午夜十二時作爲國會時間，繼續討論。詎料當晚討論土地改革案時，自由黨參議安頓紐諾（Gaudencio Antonino）因對馬戈斯主張任用委員會通過總統交議任用案時處理欠公平，在納卯省（Davao）之委任官，國民黨籍阿敏都斯所建議者均獲通過，而彼所建議者未獲批准，表示對議長不信任，正式動議改組參議院，當即獲國民黨參議員的支持，此一突然的變化，使自由黨措手不及，當即由菲蘭禮斯提議暫時擱置改組參議院案，先行通過預算案及公共工程案之協商報告，此議案爲國民黨多數黨議場領袖彭美舍斯所反對。彭氏指出該案之協商報告尚未由協商委員會呈交參院祕書處，在程序上不合，依法不能提付討論，同時安頓紐諾堅持其動議付諸表決。自由黨爲了逃避議長得而復失，不得不撥動國會正式時間，由馬戈斯議長忽促中宣告閉幕。

參院閉幕，重要議案均未及通過，本年百日常會自由黨雖獲得參院議長寶座，但幾被其黨內同僚所摧毀，目前形勢，國民黨仍然有效的控制參議院，可以隨時任意阻礙任何法案的通過。

(四) 摘置中的重要法案

(一) 下會計年度的國家預算案

本年國會會期中，兩黨政爭激烈，國民黨運用阻撓政策（Obstructionism），致使各項法案進行緩慢，自由黨在衆議院雖然係多數黨，最後亦不得不遷就環境，由兩黨議員協議，委任國民黨籍衆員費禮暫時擔任多數黨議場領袖，以取得國民黨衆議員的合作，促使各種重要法案在國會閉幕前完成立法程序。參議院方面除將衆議院已通過之地方性提案一百五十案予以通過外，重要的議案均能在閉幕前通過，現在擱置在參議院的要案包括：

關於審議國家預算案，菲憲法規定限制國會不得爲行政部門增加任何開支的項目，同時非經國會同意，政府亦不得任意增加開支，但總統對國會通過之國家預算有項目的否決權（Item Vote）。馬嘉柏臬總統提出的國家預算，業經衆議院通過，其總額爲十六億一千二百八十三萬二千菲幣，移送參議院審議時，國民黨籍口反對增加賦稅，各方阻撓，最後由自由黨與國民黨參議員舉行會議獲致一項「君子協定」，將原案削減四千五百萬菲幣，計總額爲十六億

六千七百九十六萬八千菲幣，本案由參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傅悅參議員(Gil Puyat)主持討論，因參眾兩院所通過之數額項目不同，依法須由兩院組成協商委員會，進行討論求得兩院一致的同意，但協商委員會的協商報告，因未能及時送達參院祕書處，無法提出討論，而國會業已閉幕。預算案被國會擱置在菲律賓憲政史尙為初次，現在補救的辦法，除了總統在新會計年度前召開國會特別會議促請參院通過外，否則只好先執行舊預算。

○公共工程特別預算案

菲律賓政府公共工程經費不列入一般歲出預算，係編列特別預算專案提請國會審議。過去公共工程經費的分配與用途，採用分贓辦法(Pork barrel)，其中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係根據政治控制力量的大小實行分配，往往由議員與議員及議員與總統之間的一再爭持折衝公開分配，然後列入工程預算項目。菲律賓在制憲會議中決議將公共工程經費自普通歲出預算剔出，另專案編列預算，其目的為限制國會議員因爭取其選區的利益而任意增加工程項目。此項特別預算雖然難於移充其他用途，但總統有權決定公共工程的優先次序，亦所以抵制議員示惠其選區的選民。本年提出的公共工程預算案總額為三億五千萬菲幣，亦因兩院協商委員會未及提出協商報告，而被參議院所擱置。

○土地改革案

馬嘉柏臬總統為廢除現有的土地制度，實施土地改革，特向國會提出土地改革案(Land Reform Bill)并附三億預算案。本案提出衆議院時曾引起議員拒絕出席會議的風波，嗣經提出討論加以修正，其要點：①總統建議個人只可保留各種農地二十四公頃，經修改後可擁有一百四十四公頃，超過此數時始可征收其多餘部份，②原案超過法定人數或公司得以擁有的各種農地的限制以外的土地都可征收，經修正後，規定椰園、蔗園、魚池、鹽田不得征收；③原案立刻廢除現行的佃農制度，修正為須待土地改革會宣佈所有政府有關租賃農地的機關執行任務時廢除之。衆院通過修正案咨送參院後，參院立即組織研究土地改革案特別委員會，由自由黨參議員曼拉布示(Raul Manglapus)與國民黨參議員麥格塞塞(Genero

Magsaysay)共同主持，並將特別委員會審查意見，提報參院大會討論，國會閉幕前，本案尙在討論中，迄未定案。參院擱置的議案除上述三大要案外，尚有總統咨請國會通過的二十六件有關社會經濟發展計劃的法案。

三 國民黨往何處去

菲律賓的政黨組織形式上是民主的，事實上政黨的重大決策操於政黨的領袖，兩黨大致相同，平時並不設立黨部，每兩年在首都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一次，一次提名總統副總統及參議員候選人，另一次提名改選參議員及省市長候選人。全國代表大會表面上是全黨的權力機關，但因出席代表人數衆多、派系複雜，殊難作任何決定，每由執行委員會提出初選名單，由大會投票通過。一九五五年的自由黨和一九五七年麥格塞塞總統罹難後的國民黨，兩黨均因沒有全黨公認的領袖，各領袖不得不在代表大會中各自爭取代表的支持。執行委員會係由黨內參議員、衆議員、各省省長、少數閣員及約半數的非官員委員所組成。形式上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事實上各代表其區域或經濟集團的力量。政黨提名候選並不限於黨內人士，有時亦提名黨外或反對黨為候選人，即所謂「客籍競選」(Guest Candidacy)，如一九五五年國民黨提名麥格塞塞為總統候選人即為一例。

國民黨歷經奧斯敏那(Osmena)、劉禮(Laurel)、麥格塞塞(R. Magsaysay)、賈西亞四屆總統兼黨內領袖，其領導權均甚鞏固。一九六一年賈西亞競選連任失敗後，國民黨領導權落於羅里藝示(E. Rodriguez)，羅氏曾任參院議員十一年，在黨內為元老，地位崇高，本年國會參院議長改選，未能獲得全體黨籍議員的支持，致使議長落於自由黨的馬戈斯。羅里藝示失去議長職位，連帶動搖其在國民黨內的領袖地位，使國民黨再度陷於無領袖狀態的危機，目前該黨急待處理的重大問題正因失去黨內領導中心而發生困擾：

(一)新領袖的人選——自參院議長落選後，國民黨內部少壯份子即醞釀推翻羅里藝示的領導地位，但因黨的主席向由全黨代表大會推選，除非再度召開代表大會——本年度代表大會甫於月前召開

本刊第二卷第八期目錄

一、**爭難解決**。關於新領袖人選，一須考慮人選在黨內的聲望，又須顧及其個人的經濟能力與政治背景。國民黨高階層領導份子中如參議員中的杜仁珍諾（Arturo Tolentino）、洛帛示（Fernando Lopez）、傅悅（Gil Puyat）、彭美舍斯（C. Primicias）、孫武朗（Lorenzo Sumulong）均孚衆望。論領導才能與氣魄當屬杜仁珍諾，且為少壯派所推重，其次為洛帛示，洛氏品德兼優，為糖集團領導份子，經濟力量雄厚，近年來因糖集團案為馬嘉柏臬所注視，個人政治環境欠佳，殊少公開活動。

(1) 參議員候選人提名——本屆任滿的參議員八名，其中三人隸屬自由黨的是描佬（Eulogio Balao）、例拉羅沙（Rogelio de La Rosa）和巴里惹（Ambrosio Padilla），隸屬於國民黨的五人是財政委員會主席傅悅（Gil Puyat）、藍帶委員會主席黎禮斯瑪（Oscar Ledesma）、多數黨議場領袖彭美舍斯（C. Primicias）、杜仁珍諾（Arturo Tolentino）和羅西例林（Roseller Lim），均為國民黨重要領袖。參議員選舉雖為全國普選，但往往須顧及區域分配，黨內提名又必須儘量在改選參議員的故鄉保持一個候選人，其人選恆視反對黨所提出的候選人再羅致適當人士，因此在代表大會中儘管開列候選人名單，最後則授權執行委員會決定。本屆改選參議員國民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已提出候選人名單：(一) 首都杜仁珍諾參議員，(二) 中呂宋區傅悅參議員，(三) 北呂宋區杜仁珍諾參議員，(四) 前司法部長陸諾（Dionisio Kino），(五) 南區是最近曾在參院連續演講二十餘小時阻撓自由黨爭奪參院議長的羅西例林，(六) 西米獅耶區前任怡朗市長現任衆議員顏遜（Ganzon），(七) 最近在衆院發表特權演講詆譭馬嘉柏臬總統，而遭衆院十五人委員會調查的賈芒芒衆議員，(八) 米骨區現任衆議員白拉達（Vicente Peralta）。本屆改選參議員對國民黨的繼續控制參議院關係重大，國民黨必須在十一月間選舉時獲得五名以上的新議員；否則，就無法與自由黨在參院抗衡。

有人以為菲律賓政局，國民黨的時代業已過去，實不盡然，國民黨在菲島廣大的農村仍有其不可忽視的潛勢力。

五十二年五月廿八日

共匪與巴基斯坦之「邊界協定」(下) 歐陽無畏
歐陽援外問題之研究 鄧公玄

察國局勢的觀察 張耀秋
美國遠東政策的原則 張貴永

蘇俄各加盟共和國選舉之分析 關素質
匪俄交惡對當前共匪經濟之影響 李明耀

蘇俄的文藝整風運動 尹慶

蘇俄農業管理改制後的農業 吕耀

越南局勢的發展 翟德衡

英國政局展望

亞丁與南阿拉伯聯邦

動態述評

◎ 國際

① 安理會通過塞控葡萄案。 ② 鴉片生產地在大陸漫邊。

③ 中非聯邦即將解體。 ④ 東約組織軍事代表集會。

⑤ 東約組織外長會議。 ⑥ 加拿大大選。

⑦ 埃敘伊三國合組一聯邦。 ⑧ 海地多明尼加發生糾紛。

⑨ 法國外長應邀訪日。 ⑩ 日俄漁業談判簽約生效。

⑪ 提高原棉收購價格。 ⑫ 摘斷葉尼賽河。

⑬ 俄國防部長訪印尼緬甸。 ⑭ 俄與索馬利亞關係。

⑮ 俄與亞非其他國家關係。 ⑯ 劉匪少奇在印尼活動。 ⑰ 總對劉匪表示冷淡。

⑲ 刘匪簽換貨償債議定書。 ⑳ 劉匪寧赴新西蘭。

伯

淵

緬甸新經濟政策的背景與特質

陳德規

一 新經濟政策的背景

緬甸聯邦於二次大戰後宣告獨立，在亞洲新興國家中追隨印度而採取所謂「中立政策」。至一九五八年九月發生第一次不流血政變，推翻宇汝內閣，由國防軍總參謀長尼溫將軍組成軍人政府，實施軍政統治，迄一九六〇年重新舉行普選，還政民選政府，宇汝所領導的自由同盟廉潔派又告獲勝，重新執政，並在其執政期間改稱為聯邦黨。這次政變後實施軍政期間，對政府的基本政策，未作重大的更張，而且推行具有相當成就。但是宇汝內閣再度登台後，依然一籌莫展，又使緬甸的局勢陷於混亂，經過兩年的支撐，至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第二次不流血政變又告發生，仍由尼溫將軍領導軍人集團，組織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接管政權，成立革命政府，推行新的政策。

第二次政變後成立的軍人政府，在最初的一個多月內，還看不出其有何重大變易；但是到了同年四月底，頒佈了一項以實施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中心的新政綱——「緬甸社會主義路線」，才引起國內及國際上的注視，感到緬甸軍人這次所發動的政變，其動機和目的殊不單純，實有異於上次政變。同年七月四日，革命委員會又公佈一項「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章黨綱」，宣稱着手組織一元化的新政黨，以保障上項新政綱的貫澈實施。至一九六二年，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宣告成立，而對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也日益加亟，政局呈現演化的徵象；迄一九六三年二月初，軍人政府終告改組，排除內部主張緩進的穩健份子，左翼勢力大見抬頭，乃即全面推行高度集中化的新經濟政策，極度左傾的經濟風暴，橫掃整個緬甸，對內對外都發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早在緬甸聯邦獨立之前，當其國父翁山發動民族運動期間，即已宣稱以建設緬甸為社會主義國家為其目標。但是翁山所倡議的社會主義，究竟是屬於何種類型，並無明確的範疇；但其非共產主義，殆可斷言。唯其如此，所以以後緬人對社會主義範疇的認識也有出入，對其實施方式也滋生歧見，時左時右，時緩時急，造成緬甸獨立以來政局欠穩，給予共黨以乘機滲透運用，施展統戰陰謀的機會。

當翁山於緬甸獨立前組織德欽黨時，緬甸共產黨人，即全部加入德欽黨，明滋暗長，從中操縱；迨翁山被捕下獄，共黨份子便由把持而至陰謀篡奪德欽黨，迫使德欽黨內的自由份子，不得不紛紛脫黨另立門戶。嗣後緬甸的政黨，如民主黨、愛國黨、大緬甸黨、自由同盟，以及社會黨，都是由此產生的。但當他們組織新黨時，緬共又都有隱蔽份子滲入到各新政黨裏去。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日本侵緬，翁山獲釋，其所領導的社會黨日益壯大，緬共又通過其在各政黨的潛伏份子，以實現「抗日統一戰線」為號召，聯合所有黨派，組織「反法西斯自由大同盟」，全面向各黨派滲透。因此共黨的毒素，早就利用社會主義的溫床，透過統戰活動，滲入緬甸政黨。

緬甸聯邦獨立後，社會主義的精神雖已納入憲法，但共黨因未能掌握政權，遂發動武裝叛亂，一面仍利用其潛伏份子，對執政黨從中挑撥離間，使其內部意見分歧，政策忽左忽右。以後宇汝內閣

從內對外都發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政策的左傾，爲左傾份子所支配，也是被共黨份子所滲透的後果。而緬人所謂的社會主義，其內涵閃爍不定，以及缺乏實施社會主義的必備條件，致爲共黨所乘，陷於社會主義的迷津，也是一大不幸。

這種傾向同樣的也發生在軍人之中，尤以少壯軍人對社會主義的迷戀，有的甚至希望其能於一夕之間，立告實現。緬共既尚未能以武裝叛亂，獲逞其奪取政權的陰謀，因此也一面向國防軍施展滲透，一面利用少壯軍人對社會主義的幼稚心理，從中煽惑操縱。當前緬甸嚴重局勢的形成，其由來實既漸且久矣。

另一個鑄成今日大錯的因素，是緬甸政府畏共媚共的「中立政策」偏差，率爾承認匪偽政權，及和共產集團打交道，爲國際共產敞開滲透之門，自毀其對內防共的立場措施。一九六〇年二月普選後成立的宇汝內閣，更當匪共與印度發生所謂「邊界」糾紛後，對於一九六一年初甘冒不韪，與匪偽簽訂「邊界協定」和「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爲匪偽在亞非地區的冷戰張目；嗣並進一步續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及依以簽訂「貿易協定」，接受匪偽三千五百萬英鎊的貸款和「協助」設立工廠，擴大與匪偽的貿易；從此不但匪偽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公然赴緬「服務」，而匪偽的「訪問團體」也絡繹於途，匪偽對緬甸政治經濟滲透，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二次政變後，匪偽的「顧問」，已經成爲軍人政府的幕後重要角色。今後緬甸的動向，已經掛起緊急的風球了。

二 新經濟政策的精神

新軍人政府成立之初，除了在外交政策上發表繼續採取中立政策，接受東西雙方無條件的經濟援助，以及暫緩實施宇汝內閣所頒行的貿易國營政策，准許私人於相當時期內繼續經營入口業；並闡明其經濟政策，將着重於農業開發。但不久即於同年三月中旬着手於新政綱的制訂，至四月三十日公佈左傾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表明新政府的基本立場、信仰和目標。由於這一新政綱，強調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其精神所在，也是以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爲其中心，朝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在「緬甸社會主義路線」

從中挑撥離間，使其內部意見分歧，政策忽左忽右。以後宇汝內閣

「全文所列舉的二十八項政綱中，首五項是屬於闡發軍人政府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認識和立場的，接着又有七項是屬於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其餘十六項則分別屬於國家組織、過渡時期任務、行政、國防軍、民族問題、社會福利、組織羣衆和國民義務各方面，圍繞着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心目標而作規定。新政綱中明確指出，軍人政府要在聯邦的國家內建立的，是「合法平等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範疇是：

(一) 以公正原則和公衆利益爲目標，人人參加在內，其所獲利益，由公衆全體平均分擔，使人人經濟進展，道德品性提高，建立國民和平繁榮的新生活。

(二) 特別指明是反對人與人間相互剝奪與自私自利的惡劣經濟制度。

(三) 是爲國家民族所有人民，解決人生願望所立下的目標而工作的。

(四) 是立定了發展國家生產計劃而進行的。所謂社會主義生產事業，是把國家人口和生產力，按比例計劃，生產充足的人民生活資料，在提高人民生活和購買力的同時，進行擴大生產，消滅失業，使人人獲得生活保障。而所謂生產力，則係指自然資源（包括農田）、原料、生產工具、已經籌到的資金、農民和產業工人、技術人員、生產常識經驗和熟練技術的統稱而言。

(五) 爲了進行社會主義計劃，須將生產資源收歸國有，國家的生產資料，應屬於國家或合作和集體所有。而以國家所有部份，作爲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基礎。不論國家所有（全民所有）或團體所有，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計劃範圍內進行活動，相互支援。

(六) 在社會主義經濟計劃下，有勞動力的都應參加自己所能負擔的工作，根據自己的智力體力，享受所獲得的利益。

(七) 在緬甸社會主義下，將儘量避免差異過大，不使高者過高，低者過低，根據各人條件的差異，依正確的計劃進行。

基上所述，可見新政綱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國家民族的前提下，建立「人人參加，公平享受」的社會主義經濟制

度，而將生產力和生產資料，統一於「生產力」的範疇下，以國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團體所有制，作為其生產關係，拿「各盡所能，按勞給值」，而不使其發生過份的差異，來調節分配，進行社會主義計劃，擴大生產，提高人民生活，發展經濟，構成其所要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也是軍人政府新經濟政策的基礎。綜觀「緬甸社會主義路線」全文，誠如所云，是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上，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國家。雖然此項新政綱也會強調國家民族的利益，以及慎重避免左派的操縱，但是不論是其目標和立場，其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看法和做法，對國家組織的觀念，對過渡時期所採取的辦法，對行政機構和國防軍的任務，對羣衆組織的原則等等，大部份甚至可以說幾乎純粹採取唯物論點，以共產主義理論為其基礎，在很多地方都是仿效匪共在中國大陸的暴政方式，祇欠清算鬥爭那一套而已。據說此項新政綱，乃出諸革命委員會內部左翼集團首腦丁北（Tin Pe）准將和匪共「顧問」之手，殆屬符合事實。

不過上項極端左傾的新政綱，終一九六二年並未全面付諸實施，祇是在漸進的過程中，被逐步推行，尤其是國有化的經濟政策。因為在這一時期，軍人政府的經濟行政大權，是操在主張緩進的安吉（Anng Gyi）准將手上。安吉和丁北同為尼溫將軍屬下的實力派，尼溫將軍年老庸弱，實際上祇擁有虛名。安吉以一身兼任工業發展、貿易供應和經濟各部的首長，兼攝國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長；丁北則主持農業和勞工部，向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著稱。安吉的緩和政策早為丁北所不滿，內部鬥爭自始即已存在。丁北為擊倒安吉，乃積極拉攏軍人集團內部的實力份子，然後向安吉攤牌，全部否決安吉所採行的步驟，把安吉鬥垮，轉而全面實施驚世駭俗的高度國有化政策。

三 新經濟政策的特質

緬甸聯邦軍人政府的新經濟政策，是以高度的集體化為其基礎。嘗其「社會主義路線」新政綱頒佈之後，工商企業收歸國營政策

，已經逐步採行。至一九六三年二月初內部實行改組，左翼集團獨攬大權後，益見雷厲風行，全緬實施高度的國有化政策，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 商業——進出口業務將全部收歸國營，商人在銷售方面如有一定的能力，可以經營銷售工作。

(二) 工業——除現有工業企業外，不許私營工業創設新企業；現有工業必要時也將收歸國營。

(三) 米穀業——政府將收買稻穀及大米，其出口悉歸國營，並將設立碾米廠，必要時米廠也將收歸國營。

(四) 銀行業——國內所有銀行，包括外國銀行，一律收歸國營。

(五) 木材業——收歸國營。

(六) 農業——將成立集體農場，所有農村老幼男女，均須參加勞動，以工分割計酬。

從緬甸軍人政府目前所推行經濟政策的產生背景、精神及其內容方式來看，我們可以見到這一新經濟政策，含有以下幾點顯明的特質：

第一是共產主義的傾向。這一新經濟政策不但以全面國營為其最高形式，而且也仿效其他共產政權，要推行集體農場，定下了其所謂「過渡時期」辦法；甚至把銀行收歸國營後改稱「人民銀行」，把商店收歸國營後，如藥店也改稱「人民藥店」，一如其於內部改組後新成立的統一安全機構，稱為「人民安全委員會」然。目前祇是其政府尚未改稱冠以「人民」而已。這種實質上和外稱上的共產主義傾向，實在有點近於瘋狂，與其一貫的內部防共剿共立場相矛盾。我們雖然未能據此遽指其已淪於赤化，但是事實彰彰，其已走向赤化深淵的邊緣，殆屬顯然。

第二是軍事獨裁的傾向。二次政變後組成的所謂「革命政府」，僅外交部長宇智漢是文人，其餘則是清一色的軍人，一切以國防軍為主體，其所籌組的「緬甸社會主義路線黨」，也先在軍中發展，以入黨的優先權保留給軍人。在停止憲法行使，解散各級議會之下，不但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級行政、司法人員悉由軍人接替，就是

當其「社會主義路線」新政綱頒佈之後，工商企業收歸國營政策

下，不但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級行政、司法人員悉由軍人接替，就是

全國的公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一律委派軍人充任主管及指導主任；整個經濟行政事務和企業機構，悉已操諸軍人手中，其所得的一切經濟利益，也全部歸於軍人所組織的政府所有，造成高度獨裁的經濟上「唯一大私有主義」。

第三是官僚主義的傾向。高級軍事獨裁的結果，自始即已帶來了官僚主義，在經濟上的表現尤為顯著。依據官方和輿論的透露，軍人政府下的經濟機構，經常發生盜竊、舞弊、浪費、失調的情事，更談不到企業精神，這是獨裁政權和「外行領導內行」必然的結果。軍人政府內部改組後，全面國有化政策的擴大實施，以及經濟機構人事的進一步軍人化，更把那些幼稚無知的軍人，大量派到經濟機構中去擔任高職，其官僚主義的範圍和歪風，益形瀰漫，其所滋生的毒害和惡果，自將與日俱深。

第四是排斥外資的傾向。軍人政府在未改組前，即已宣稱不歡迎外資，廢止保障外資條例；改組後又更進一步同時接管外國銀行，以及進一步施行嚴格管制外僑的新法令，重新登記外僑，審查外僑的再入境及是否真正永久居留，以及限制攜帶緬幣出境，藉以配合全面國有化政策的擴大實施，防止資金外移。外僑經濟在這一新經濟政策下，不但趨於萎縮或橫遭扼殺，即欲自行他移，另闢生路亦不可能。至是軍人政府新經濟政策排斥外資的傾向彌見澈底，不但杜塞了吸引外資之門，抑且將把外資趕盡殺絕。

第五是爭取農民的傾向。緬甸農民約佔全國二千二百萬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軍人政府為爭取農民，鞏固其政權基礎，一開始就聲明新政府的經濟政策，將着重農業發展，擴大生產。其政府部門內最被重視的農業部，即係由左翼集團的首領丁北主持，目前正着力於推行農業生產現代化工作，準備設立農業技術研究所等，以資配合。但是在土地國有政策，以及米穀業國營下，政府以低價收購米穀，農民對此已產生怨望，一旦計劃中的集體農場見諸實行，恐將發生更大的騷擾；其爭取農民支持的目的能否達到，大有問題。

四 新經濟政策的影響

所產生的影響：

第一、緬甸軍人政府的新經濟政策，雖然曾強調其將避免左右派的操縱，並曾於內部改組後聲明其係排斥唯物的觀點；但就其內容和特質來看，顯然是在仿效共產集團的政策，尤其是與匪共在大陸的暴政有若干相似。其所能產生的影響，不但是經濟的，而也是政治的。發展下去不但將使其政權變質，而且也將影響其對外立場和東南亞局勢。

第二、緬甸目前還是一個低度開發的新興國家，生產不足，甚至其最主要的食米產量，也還未恢復戰前的水準；資源未能開發利用，交通不便，工業基礎脆弱，技術落後，資金拮据，一切均尚欠缺，現代經濟所必備的基礎和條件，乃竟盲目施行高度集體化經濟，以過分的集中和統制，扼殺經濟正常發展的生機，勢將摧毀原有脆弱的經濟基礎，釀成嚴重的經濟危機。

第三、發展中的國家，有賴吸引外資，促進經濟成長，緬甸軍人政府乃竟反其道而行，並且進一步摧毀當地的外僑經濟，除了妄遂其集中獨佔的慾望外，可以說一無是處。這種孤立自為的落後傾向，也暴露出其新經濟政策的一大漏洞，對現代國家經濟的正常發展，自絕於國際經濟合作的大道。

最 新 非 洲 形 勢 圖

蔡 正 倫 編 繪

國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所 印 行

七彩精印，道林紙四開一大張，實為目前國內最新最詳盡的非洲掛圖，附郵三元即寄，郵費免收。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一三七號
郵政劃撥三三四六號

緬甸新經濟政策的背景與特質
當前局勢下新經濟政策的進展，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其

匪區耕地問題

劉岫青

我政府宣告廢棄中蘇條約後，外蒙古重又歸隸我國版圖，惟共匪統治下之大陸，外蒙古事實上並不包括在內，全大陸土地總面積（除台灣外）共爲九五六萬方公里。

大陸可耕地面積究有多少，各方尙無定論，惟佔總面積百分率極低，則爲公認之事實。可耕地中已經墾闢種植者爲耕地，未墾部份則爲可耕荒地。土地可耕與否主要決定於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即地勢、氣候、土質等是否適宜於耕作。

大陸主要山脈與河流大多均由西北走向東南，西北高峻而東南低平，山岳及高原之面積遠較平原盆地爲大。地勢、地形及氣候情形之複雜影響土壤與作物之生成使可耕地之範圍受到嚴格之限制。

一、依地勢高低觀察，大陸各種高度所佔總面積百分率估計如次：

海拔高度（公尺） 佔總面積%

○—五〇〇

一六一

地形平坦，土壤肥沃，大部宜於農耕。

○五〇〇—一、〇〇〇

一九一

多介於盆地與丘陵之間，谷廣坡低之處，宜於畜牧，僅小部份可以農耕。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

二八一

多爲高原，宜於畜牧，僅地勢高峻，氣候寒冷，土壤瘠薄，不能耕作。

○一、〇〇〇—五、〇〇〇

一八一

一九一

以上

地形
佔總面積%
平原
盆地
丘陵
高原
山岳

二、依土地起伏觀察，大陸各種地形所佔總面積百分率估計如次：

地形
佔總面積%
平原
盆地
丘陵
高原
山岳

三、從季風與降水量觀察。
大陸每年冬季十月至次年三月之六個月中乾燥寒冷之季風，自西北內陸吹向東南，夏季則相反，每年五月至八月之四個月中濕潤溫暖之季風自東南海洋吹向大陸，降水量之地區分佈極不均勻，大體言，東南最多，愈向西北愈少，華北較華南少，西北又較華北少。大部地區全年雨水多集中在夏季下降，降水量之年變率亦頗大，致經常引起洪水之泛濫。降水集中率各地區分別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不等，年變率各地區分別自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不等。年降水量地區分佈如左：

東北	二五四一八六〇公厘
內蒙	一五四一五八四公厘
新疆	五一一二九七公厘
西藏	三〇五
華北	二七九一一、四四八
華中	四八三一二、一八四
華南	八八九一一、一五九

灌漑之外，極小部份無法經營農作，故二五〇公厘之等雨線由溝洲里起經內蒙中部繞過包頭再到達青海高原一成爲農耕與畜牧之分界線。

四、從氣溫與無霜期觀察
大陸氣溫變化劇烈，大致自南至北，愈北愈烈，對無霜期之長短有決定性之影響。一年中最熱之月與最冷之月平均溫度差，黃河中游陝甘一帶達攝氏二四至二六度，東北內蒙且達五〇度，一日間氣溫之變化，黃淮平原與東北地方之南部爲攝氏一〇一二度，東北地方北部及內蒙爲一二一四度，西北及蒙新高原且達三〇度。故無霜期南方較長，愈北愈短。無霜期一二五天爲農作物生長成熟。

至少需要之日數，短於一二五天，一般作物縱能生長亦無法成熟，此等地區均不適於農耕。故有無霜期一二五天之線為青麥之北界，亦為農作區域之極限。

就前述各種不利於農作之主要限制分析，大陸幾乎有佔總面積三分之二以上之地區均不適於農業之經營，其餘三分之一的可耕區域尚有江河湖澤水面及若干坡度較陡、土質太粘、含砂過多、滷性過重之土地無法墾植，而秦嶺以北地區終年均苦雨量不足，發生沙漠南移現象，故大陸可耕地面積事實上必然甚低，三分之一成為其不易達到之最高極限。

大陸可耕地數量從未經過普查，存在面積究竟有若干，無法得到精確數字，各方估計頗多，但以查估地區對象以及查估方法之不同，結果高低不一，甚至相去甚遠。戰前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印「中國土地問題之統計分析」一書曾參照各種估計數字及其所依據資料，加以整理，重行估計，全部可耕地為一、六三二、七二五方公里，折合二十四億四千九百萬畝，約佔總面積九五六萬方公里之十七·〇八%，其中已墾耕地為九三一、七六九方公里，折合十三億九千七百七十萬畝，佔總面積九·七五%，及可耕地面積五五%；可耕荒地面積為七〇〇、九五六方公里，折合十億五千一百四十餘萬畝，佔總面積七·三三%，及可耕地面積四五%。戰後三十六年主計處編印「統計彙報」，除外蒙不計外，全部耕地面積為十四億一千零七十三萬畝，已較戰前增加一千三百萬畝。張德粹教授認為大陸可耕地總數不致超過二十四億畝，已墾耕地約為十四億畝，可耕荒地尚有十億畝。沈宗瀚博士認為可耕地面積至多佔總面積一五%，今日共匪已將外蒙拱手送人，照大陸實際面積改算所佔百分率應為一八·二%，其絕對數約為二十四億六千萬畝。三種數字實際甚相接近。據共匪稱，大陸可耕地面積為三十億餘畝，約佔總面積二%，除十六億餘畝已墾種外，可耕荒地尚有十五億畝左右，較前述數字高出二成以上。此處必須重加指出，我國可耕地、耕地及可耕荒地過去均未經普查，任何估計數字先天均不免有或多或少之偏差，同時因農民對所耕土地在人性上均抱有隱匿少報之傾向，此可於過去辦理土地陳報地區所發現之事實獲得證明，例如十八年浙江

省舉辦土地陳報，因所採查丈方法較一般查估方法比較精密，陳報結果較賦冊所載增加甚多，田、地、山、蕩四類土地合計自一五·八五九方公里增至三七·六三七方公里，計溢出四〇%左右，又如江蘇省二十三、二十四年舉辦鎮江、宜興、江陰、溧陽、蕭縣、江都、沐陽等七縣土地陳報，亦均有不同程度之溢出，最少如江陰溢出二·三%，蕭縣溢出八四%，沐陽溢出更多，竟達一二一%。另一方面人口日增，在求生意志鼓舞之下，農民勤苦奮鬥之結果，耕地亦必有緩慢之增加，足見一般認為十四億餘畝之耕地面積必已較實際數字為低，旅美研究中國經濟之吳博士 Y. L. Woo 曾指出共匪未據大陸前，大陸耕地約共有十六億九千五百萬畝，其中本部為十四億一千萬畝，東北二億五千五百萬畝，新疆熱河及西藏約三千萬畝。此一估計約高於前述三種估計二成左右，頗為合理。耕地既較過去所估增加二億七千萬畝，則可耕荒地應即比例減少為七億至八億之間，共匪所稱十五億畝，似乎估計過高。最近，共匪曾派遣大批科學技術人員前往黑龍江、新疆、青海、內蒙、寧夏、西藏、雲南等約四百二十萬方公里廣大地區進行為期數年之考察勘查，提出報告稱，上述地區內有幾億畝土地可供開墾（見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大陸可耕荒地約七〇%以上均集中在該等地區，經過長時期實地考查僅有幾億畝，則令大陸可耕荒地之不可能超過十億畝殊屬顯然。

大陸可耕荒地與人口之分佈亦極不均勻，如在地圖上黑龍江之璣璋與雲南之騰衝間繪一直線，可將大陸分為兩個顯然不同之區域，直線西北佔全部面積六四%，而人口則僅佔四%，直線東南佔全部面積三六%，而人口則佔九六%，此一分佈偏在之情形更增加大陸耕地問題之嚴重性。

共匪一九六〇年公佈大陸歷年耕地面積，每年均有不同數量之增加。自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共增加二億零九百二十萬畝，全部耕地為十六億七千七百四十萬畝。茲加分析如次：

共匪三十八年耕地十四億六千八百萬餘畝之數字顯係因襲過去各種估計數字而來。三十九年起每年耕地數字可能因墾荒及平整土地而有所增加，亦可能因變更使用等原因而有所減少。至四十一年

突然升高至十六億一千八百萬畝，增加率一成以上，主要當係過去一部份隱匿耕地已在土改中被查出；四十二年起開始實行計劃經濟，並逐步推行農業合作化，農民所有耕地更受到進一步之清查。至四十六年耕地又增至十六億畝。共匪聲稱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三年中共開墾荒地二千六百萬畝，新華半月刊四十六年八十八期，聲稱自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全國共開荒六千六百三十五萬畝，前後合計開荒數共為九千二百三十五萬畝。開荒之外，共匪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曾大規模推行平整土地之運動，田塍地埂之調整與除去，亦可使耕地有部份之增加，但秦嶺淮河以北平原旱耕區域原來耕地關係大片連接，除必需之農道外，權利之分別只有界樁而無地埂，至淮河秦嶺以南之水田區域，田塍之存在，基本上乃係基於保水灌水之必要，權利分別僅係次要目的，大部份均無法加以剷平，故平整土地所能增加之耕地面積，絕不會如一般人想象之多。此八年間，大陸地耕地由於城市擴張，工業建設，交通發展，水利興辦等被變更使用及因水土流失與地力枯竭被拋荒者面積無可查考，但為數當不在少，共匪先後開荒九千二百三十五萬畝，加上平整土地所增加之耕地，減除變更使用拋荒部份後仍能如公佈數所顯示增加二億零九百萬餘畝，主要當係土改及合作化過程中查出之部份，而非真正有所增加，否則將無法說明如許耕地增加來源之所在。又四十六年耕地面積較吳博士所稱淪陷前數字尙短少一千七百五十五萬畝，可見開荒九千二百三十五萬畝與平整土地所增加之數字合計尙不及變更使用與拋荒部份數字之大，其差額可能即為此賬面上短少之一千七百五十五萬畝，而變更使用與拋荒之耕地至少當在一億畝以上，自可斷言。四十七年耕地突然減少六千餘萬畝，主要乃係基於大辦鍊鋼，大興水利，大辦交通之需要，將耕地廢棄改作他用。四九年計劃減少耕地一億畝左右則因實行少種多收方針試行基本農田制之所致，此則與過去情形完全不同，目前耕地面積似又已恢復至十六億四千萬畝左右。

大陸人口較美國高出三倍，而耕地面積則僅其半。全人口基本生活所資均賴農業，共匪工業化資金之積累，亦以農業為唯一之支

柱。故初期對墾荒頗為重視。共匪開墾荒地，不外採用下述三項方式即羣衆就地開荒，移民開墾及國營農場機械開荒。

就地開荒目標為老農業區，老農業區地理環境適宜農耕，但可墾荒地絕大部份早已開墾種植，小部份拋荒之原因主要不是坡度太陡（大多超過十五度），即是土質過薄。加以開墾不是引起水土流失，即是收穫過少，得不償失。移民墾荒往往水土不宜，無法持久。國營農場機械開荒，目標為荒地大片連接之邊疆地區，水利交通等基本建設不在內，墾費平均每畝即需要僞幣一〇〇元，殊非目前共匪財力所能負擔。更重要者為共匪開荒之制度，一方面強迫驅使農民，同時開荒之利益復不歸開荒者所享有，由於前述原因，墾荒者並無積極勇進之氣概，故開荒並無明顯成績。若干地方荒地開出後不是無法利用，即是種植所得不够成本。與美國中西部開發時墾民所抱冒險犯難爭先恐後之先鋒創業精神以及今日所獲之輝煌成就相較，適為一個鮮明之對照。

共匪開荒計劃遭受挫折後，目光轉注於提高複種指數，以期單位耕地面積產量之增加。我國戰前複種指數，據張心一氏之調查為一二三（見氏著「中國農業概況估計」），共匪不斷擴大種植面積，至四十七年複種指數已提高至一四五。戰前耕地冬季大多休閒，主要目的在翻耕土壤，促進分化、蓄水以利春播或種植綠肥以供來年作物之營養，共匪不斷提高複種指數使前述三項目的無法達到，故土壤肥力日漸消失，生產減退，部份耕地因此而拋棄。依共匪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將大陸分成黃河秦嶺及白龍江以北，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及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三個農業大區，規定依照各該區地理環境分別逐步提高複種指數，此一計劃實現後，大陸耕地指數可望提高至一六六。如不生產及進口五千萬噸以上之化肥，全部農業均將成為掠奪經營，地力耗竭亦將成為無可避免之結果。共匪農業生產之不能進步，耕地面積及可耕荒地面積之不足為根本原因之一，其狂熱追求與無法拋棄之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加深了此一問題之嚴重性。

日英關係的新發展

朱少先

由於日英關係的接近，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也鋪平了日本進入歐洲市場的道路，一旦日本參加經濟合作開發組織之後，其對歐洲之貿易，亦可獲得相當進展。不但表示了日本已改變了對美一面倒的政策，一面也加強了對美國商議各項問題的立場。真正做到了池田首相在歐洲所標榜的「歐洲、美國、日本是自由世界三大支柱」的目的。因此，日英關係的加強，對未來整個自由世界，顯將有極大的影響。

一 前言

日英兩國自十六世紀中葉起，已有了商業往來，至一八五四年簽訂「日英修好條約」，一八五八年締結「日英通商條約」後，始正式發生外交關係。近百年來，兩國始終維持友好關係，尤其是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一年兩國所簽訂的第一、二、三次「日英同盟條約」，對國際間，特別是對我中華民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該項同盟的訂立，在英國可減少其東顧之憂，鞏固了在遠東的既得權益；日本藉此在一九〇五年戰勝了俄帝，成為亞洲強國，對中國則為所欲為，一九一四年的出兵佔領山東，一九一五年的提出所謂「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而一九三一年的滿洲事變及其後之侵華戰爭，均與此有關。

二 促進日英新關係的背景

二次大戰發生之後，日英關係因此中斷，戰後英國受戰爭影響，國力衰弱，各殖民地均先後獨立，過去在國際上之霸權，多為美國所替代。對日本關係，雖因簽訂了舊金山和約而恢復了正常，但已不若過去之密切，兩國貿易總額，一九五〇年不過三千二百六十萬美元，一九六〇年亦僅二億一千八百萬美元。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兩國締結「日英文化協定」後，文化交流恢復活躍。一九六二年十月，日本工商會議所會長足立正，曾率領

包括財經工商界領袖二十餘人的經濟代表團訪問英國，英國亦由倫敦商業會議所會長莫爾瑪諾克會長率領經濟使節團訪日；繼之，日本外長大平正芳，自民黨領袖佐藤榮作亦相繼訪英，兩國關係，漸見密切。及至去年十一月池田勇人首相訪英，並與英國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三月二十八日英國外長休姆又親訪日本，四月四日正式交換了商約批准書，使日英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目前國際局勢，當然不同於二次大戰以前的情形，日英兩國亦無法再重溫過去日英同盟時代的美夢；但無疑的，由於日英通商條約的簽訂及休姆外長的訪日，已促進了兩國間的政治與經濟關係。尤其是英國一套對共產集團貿易的想法，可能影響今後日本對外政策的決定，值得注意。

會受到前所未有的熱烈歡迎，英國女皇亦破格接見，預定十五分鐘的會晤，竟延長到三十五分，足證英國對日本之重視，加以英國自己參加歐洲共同市場（E E C）後，國際貿易地位驟降，出口減少，國內經濟發生困難，失業人數大增。因此，英國政府乃轉移目標到亞洲地區，尤其對世界工業國之一的日本特別重視。交涉七年的一「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卒於池田首相訪美的短短數日中順利解決，而英國外長休姆且破例親訪日本，其原因殆即在此。英國不但希望與日本加強經濟關係，更期待與日本合作，擴展對匪俄貿易。

在日本方面，為達成其「十年國民所得倍增」的高度經濟成長計劃，必須擴大對外貿易，故自去年下半年起，積極展開對外經濟攻勢，除對俄帝簽訂一項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三年貿易協定（貿易總額為六億七千萬至七億美元即每年約二億三千萬美元左右）及民間造船協定（總額約一億美元）外，對共匪亦簽訂了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七年的民間五年貿易協定（貿易總額為五億美元，即每年約一億美元）。

目前日本對外貿易最大對象為美國及亞洲，約各佔其總額的三分之一。但東亞地區各國外匯缺乏，美國因受「美元保護政策」之限制，勢無法再行擴展，只有歐洲市場，尚有發展餘地，去年池田首相、大平外相及若干民間經濟使節團訪歐，其主要目的，厥在謀求擴展對歐貿易。池田在倫敦與英國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協定」，更是池田訪歐的最大目的，該項協定中，英國放棄了對日本差別待遇的條款，而適用最惠國待遇。因為有了英國的先例，現在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歐洲國家，也正式廢除了「貿易關稅一般協定」第三十五條有關對日差別待遇的限制，殊有利於今後日本對歐洲的貿易。其次，日本參加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 E C D）問題，過去美國曾多方協助與支持，希望日本亦成為自由世界最高經濟組織中的一員，但因為歐洲若干國家的反對而始終未得加入。此組織似已無多大問題。現在由於英、法、美國極力支持，日本加入該

約在未來O E C D組織內通力合作。英國並表示願意在日本對低度開發國家援助及降低關稅交涉方面，予以全力支持。日英兩國，由於彼此客觀上的需要，且在主觀條件上亦已有達成合作的可能性，而五月四日生效的「日英通商航海協定」，更構成加強兩國經濟關係的橋樑，也奠定了兩國在國際事務上合作的基礎。

三 休姆訪日所發生的後果

休姆外相訪問東京，是近百年來第一位英國現任外相訪日的第一人，其意義非常重大。在表面上，休姆訪日，是代表英國麥米倫首相答聘池田首相的訪問英國，但實際上却是日英關係進入新階段的具體表現。休姆訪日的成果，並不在交換「日英通商航海條約」的批准書及兩國的互相了解，而是英國對共產集團貿易一套理論，或將使日本親共黨派振振有詞，從而影響日本政府對共政策，其後果值得注意與憂慮。

休姆外相對共產集團政策與貿易的觀點，大要有下列兩點：（一）如果共產主義者能尊重人類的幸福與尊嚴、東西陣營間的「共存關係」，可成為「合作關係」；「我人希望能有一天達成此種理想。但可惜彼等之態度，仍舊是鬥爭的，因此，對於共產主義者不得不以敵人視之。」（四月三日休姆外相在日英協會午餐會之演說）。

（二）對共產集團貿易，應在與理論的、思想的、政治的立場分離的原則下，力求發展，透過擴大對共產國家貿易，使其物質生活豐富，則對共產主義之威脅，自然減少。（四月二日休姆與池田會談中表示）。

英國承認共產國家是敵人，其反共立場是無疑義的；但主張以貿易使共產國家富強，則對共產主義的說法，較日本過去所謂「政經分離」的對匪貿易政策，更為荒謬。但與最近日本出現的一項「西方可予共匪以工業及經濟援助，以解除共匪之軍事威脅，使其外交政策轉趨較平和之路向」（見四月八日中央日報社論）怪論相前後呼應。

據黑金內閣祕書長事後透露，池田首相對休姆的主張，並未正面反對，僅對共產國家擴大貿易意見表示一致，不過池田主張在COCOM（對共產集團輸出統制委員會）的規定範圍內予以擴大。

大平外相與休姆會談時，亦曾表示：「英國對共產國家貿易的主張，只是一種原則；而現實上能否擴大對共貿易，又是另一問題」。暗示了日本對共匪政策，與英國有若干不同之點。

休姆外相對共產國貿易的主張，雖然未被日本政府正面接受，但相信日本今後處理共匪問題，將發生極大的影響作用，而且加強了對匪貿易的藉口。

休姆外相回到倫敦之後，表示兩國對國際問題的看法非常接近，兩國為便於商討有關兩國間的各項問題，將設立一項較大使級尤為正式之機構，定期商討各項政治經濟問題。根據日本東京新聞透露，英國此項提議，日本已表示同意，並且建議每年開會二次，分別在東京及倫敦舉行，以兩國外相為首席代表。雖然在規模上預料將不若日美經濟會議之龐大，但由於英國在外交史上有其豐富之經驗及傳統，此項「日英協議機關」，勢將影響日本對外政策，尤其對共匪政策，殊無疑義。

四 結 論

日本基本立場是反共的，同時也站在自由世界一邊，那是毫無疑問的，去年池田首訪歐洲時，亦會再三強調日本是亞洲反共的堡壘。至於對共產集團的貿易，特別是對共匪的貿易，去年池田在倫敦時曾表示將採取與歐洲各國相同的「延期付款輸出方針」，其政府欲擴大對匪貿易的想法，與英國的立場是完全相同的。但日本今日所處國際環境，與英國迥異；因為日本今日在防衛上及貿易上，仍須依靠美國，而美國對共匪政策，始終非常堅定，不但反對日本擴大對匪貿易，還要求日本與美國合作，共同防止共匪在亞洲的擴張。而且就共匪本身，既缺乏外匯向日本購買所需物質，又無可供輸出之產品，事實上日匪貿易無法擴大。因此，日本今後對共匪政策，雖然可能受英國若干影響，而決不致完全追從英國。不過，

今後凡遇到在對日本有利時，勢將以英國為藉口，掩飾其對共匪之行動，減少美國及自由世界的壓力。例如日本現在接受了美國禁運大輸油管輸俄的要求，但英國仍照常輸出，此事已引起了日本業者對美國及日本政府的不滿。在未來，日本亦可以英國為例，向俄帝輸出，諸如此類的事實，將大有發生可能。

由於日英關係的接近，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也鋪平了日本進入歐洲市場的道路，一旦日本參加了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之後，其對歐洲之貿易，亦可獲得相當進展。不但表示了日已改變了對美一面倒的政策，一面也加強了對美國商議各項問題的立場，真正做到了池田首相在歐洲所標榜的「歐洲、美國、日本是自由世界三大支柱」的目的。因此，日英關係的加強，對未來整個自由世界，顯將有極大的影響。

上接第63頁

二·九，依此一比率預期在一九六六年將為三千萬人口，一九七二年可達三千五百萬人，至一九八〇年時其人口數字四千五百萬。

其次，伊朗為本區域中人口列居第二位的地區。在一九六〇年時人口有一千零二十萬人，每年成長率為百分之二·二，至一九八〇年時可達三千萬人以上。至於伊朗與土耳其兩地區合併佔亞洲西南區域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又本區域人口列居第三位的地區是伊拉克，在一九六〇年時為七百萬人口。沙地阿拉伯在一五五年點查人口為六百萬人，目前的人口數相當於伊拉克在一九五六年時的人口數。據估計在過去十年間，每年人口成長率各為百分之三與百分之二·七。至一九七五年時每地區的人口將超過一千萬人以上。

至於葉門與敘利亞二國的人口各為五百萬人，據估計在過去十年間每年成長率各為百分之二·七與百分之三·一。其他，以色列為本區域中少數具有較精確人口統計的國家之一，據一九六〇年之估計其人口有二百十萬，或較之一九五〇年時增多八十五萬人，據估計其一半以上的增加數字係由於遷移的結果。基於表（五）中所採用人口計劃的原則，以色列預期在一九七五年時將達三百萬人。黎巴嫩與約旦在一九六〇年時各為一百八十萬人與二百七十萬人，其每一年成長率各為百分之二·六與百分之三·一。

蘇俄工業及建設管理制度的演變

呂律

壹 蘇俄第四屆最高蘇維埃時期（一九五四—

一九五八）中央集權制的管理制度及其流弊

近幾年來，蘇俄的經濟管理制度會經過兩次大規模的改革：第一次發生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第二次就是去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通過的按「生產原則」改組各級黨務機關及政府經濟組織的措施。

在檢討蘇俄經濟管理制度的演變時，不能不首先提到蘇俄第四屆最高蘇維埃時期的蘇俄經濟管理制度，這就是說，假如那個時期的經濟管理制度符合客觀的要求，就不會有一九五七年半年的改革，既然發生那麼一次大規模的改革，就證明當時的經濟管理制度具有重大缺點，沒有再行採取的必要。

蘇俄第四屆最高蘇維埃，是一九五四年三月產生的。這一屆的政府，計轄五二個部（其中一二三個全聯盟的部和二九個聯盟兼共國的部）和七個國家委員會。這五九個部會中，除了非經濟的和經濟關係比較間接一點的內政、國家監察、外交、國防、財政、文化、高等教育、衛生八個部和國家勞動與工資問題、國家安全、國家銀行管理三個委員會外，直接構成經濟管理機體的部會，計有：

一、全聯盟的部三個：國防工業部、機器製造部、電站建設部、石油工業企業建設部、中型機器製造部、母機製造和工具工業

部、重型機器製造部、化學工業部、電站部、電工器材工業部、儀器製造和自動化工具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製造部、建築機器製造部、造船工業部、運輸機器製造部、運輸建設部、汽車工業部、交通部、航空工業部、海運部、普通機器製造部、無線電工業部、對外貿易部。

二、聯盟兼共和國的部二〇個：貿易部、鋼鐵工業部、採煤工業部、有色金屬工業部、冶金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建築材料工業部、地質和礦藏保護部、建造部、探煤工業企業建設部、輕工業部、肉乳製品工業部、食品工業部、漁業部、造紙和木材加工工業部、農業部、國營農場部、糧食產品部、城鄉建設部、森林工業部。

三、國家委員會四個：國民經濟長期計劃國家委員會（簡稱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國家經濟委員會（簡稱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建設委員會，國家新技術委員會。

在上述的政府組織經蘇俄第四屆最高蘇維埃第一次大會通過後，又陸續增加了兩國聯盟兼共和國的部，即冶金工業企業建設部和化學工業建設部。除此之外，蘇俄自新經濟政策時期轉入工業化以後，會不斷建立一些經濟領導組織，如專業管理局和人民委員部、部和局等等。戰後時期，由於加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和發展新的工業和建設，而且特別強調專業的程度，所以又建立了更多的更專業化的部會以下的專業管理局。

這個以中央集權制為基礎的經濟管理制度，行到一九五七年初，由於蘇俄全境分散着二〇餘萬個國營工業企業和一〇萬餘個建設工地，中央的一個部或一個局很難對大量的企業和工地作有效的領

導，於是缺點完全暴露出來。這個工業和建設的管理形式，不但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的要求，而且限制了充分利用經濟體系內部的潛力。這個管理形式的流弊，最顯著的是，一般經濟領導者以自私自利的立場、本位主義的態度和官僚主義的作風對待工作，中央與企業及工地的距離太大，彼此不明瞭實際情況，致使蘇俄整個國家的利益遭受損失，使許多迫切的國民經濟任務長期不能解決。舉例來說：

一、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以及各部，對各個生產部門的情況研究得不够，同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和省、同企業和科學機關的聯繫不夠密切，在編制生產、基本建設和物資技術供應計劃的時候，往往犯嚴重的錯誤。

二、各部和主管機關既然高高在上的從中央去領導分佈在全國各地的企業，就必然出現許多平行機構，如銷售供應站、基地、托拉斯等等。但是實際上，儘管每一個部局都有一套龐大的供銷機構，在企業和工地上仍然時常發生原材料供應不及時和不齊備的現象。

三、造成上下互不通氣的原因，是各部的各總局、管理局、處和其他機構，亦如各部一樣遠離生產單位，譬如負責領導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遠東和其他遙遠地區企業的總管理局，一律設在莫斯科。

四、領導建設的部與部之間互相脫節，導致一個地區設立大小的建設單位，導致分散和凍結建設資金，導致造價高昂。

五、各部為了辦理文書圖表的人手不足，調用各企業和工地上具有實際知識經驗的幹部（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以致企業中和工地上感到幹部不够。

貳 標榜民主集中制實行工業和建設領導

下放的黑魯曉夫式的管理制度

俄共為挽救經濟上的危機，糾正經濟上過份集中的作風，從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的中央全會就開始行動，作為經濟領導改革第一步的布爾加寧「關於改進蘇俄國民經濟領導問題的報告」就是在這次全會上通過的。醞釀中的經濟領導形式，根據俄共中央該次全會所作的決議，可以看出下面的幾個改革方向。

一、採取措施，擴大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應當解決與完成全聯盟和加盟共和國國家計劃有關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問題的範圍；二、保證進一步擴大部、部屬局、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和經濟企業的權利；

三、消滅多餘的工作重疊的單位，即精簡管理機關；四、使中央經濟管理機關以及科學研究機關直接靠近企業分佈地區；

五、保障各經濟地區和大企業中心內部的經濟活動互相配合和協調。

一九五七年俄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黑魯曉夫「關於進一步改善管理工業和建設組織的報告」，在決議中主要強調兩點：一、採取措施，進一步改善工業和建設的管理，使工業和建設適應國民經濟在「共產主義建設階段」的任務和要求，諸如：領導必須接近經濟區域，擴大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權力，提高地方黨政機關及人民團體在經濟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廣泛吸引勞動羣衆參加生產管理；

二、擬定按照上述方針對工業和建設領導進行改組的具體建議，以便提交最高蘇維埃審議。

同年四月，俄共中央發表黑魯曉夫「關於進一步改進管理工業和建設的組織工作報告提綱」，提供全民討論。此一提綱內分：「管理經濟建設的列寧原則和蘇俄經濟發展的若干總結」，「國民經濟的增長情況和改進管理工業和建設組織形式的工作」，「共和國、邊疆區和省管理工業和建設的機關」，「關於進一步改進計劃工作及改組計劃統計和監督機關的工作」，「進一步擴大各加盟共和國的職權並提高它們在管理經濟方面的作用」，「提高蘇維埃機關、黨和職工會在經濟建設方面的作用」，更廣泛的吸收勞動羣衆參加

生產管理工作」，共計六太章，長達一萬五千餘言。

五月七日，黑魯曉夫在蘇俄最高蘇維埃兩院聯席會議上提出「

關於進一步改進管理工業和建設組織工作的報告」；十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公佈「關於進一步改進管理工業和建設組織工作的法律」，完成經濟領導權從中央集權的基礎上轉變為以民主集中制為基礎的立法程序。此項「法律」共計廿二條，包括下列改革措施：

一、新的工業和建設管理制度，建立在由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劃定的經濟行政區（註一）的基礎上，根據地區原則實行。為了實際的管理工業和建設，每一個經濟行政區設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其下則設技術委員會，以備諮詢。

二、由於工業和建設管理權下放，原有的中央主管部會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分別作下列撤銷或改組：

①被撤銷的機構

(一) 被撤銷的蘇俄全聯盟的部：汽車工業部，機器製造部，儀器製造自動化工具部，母機製造和工具工業部，建築機器製造部，鐵路機器製造部，石油工業企業建設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製造部，運輸機器製造部，重型機器製造部，電工器材工業部。

(二) 被撤銷的蘇俄及各加盟共和國的部：造紙和木材加工工業部，城鄉建設部，輕工業部，森林工業部，石油工業部，肉乳製品工業部，食品工業部，建築材料工業部，漁業部，建造部，冶金工業和化學工業企業建造部，採煤工業企業建造部。

(三) 被撤銷的蘇俄部長會議所屬的國家委員會：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新技術委員會。

②被改組的機構

(一) 蘇俄電站部和蘇俄電站建設部合併為蘇俄電站部。

(二) 蘇俄國防工業部和蘇俄普通機器製造部合併為蘇俄國防工業部。

(三) 蘇俄及各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長期計劃國家委員會，改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在蘇俄部長會議國民經濟年度計劃國家經濟委員會撤銷後，其職權由該會執行。

(四) 被撤銷各部所管理的企業和組織，移交各有關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直接管理。

(五) 蘇俄全聯盟各部之中的航空工業部、國防工業部、無線電工業部、造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和電站部所管理的企業和組織，移交各有關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直接管理。

(六) 蘇俄各非工業部所管理的企業，移交有關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直接管理。

(以上(一)(二)兩個部為全聯盟的部)

③新成立的機構

(一) 蘇俄及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二) 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

參 蘇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通過的「關於發展蘇俄經濟及改組黨對經濟的領導案」

改革，下放的領導權重行收回，民主集中制已成形式化。

一時成為黑魯曉夫新政象徵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到今天雖然已有五年的歷史，但是蘇俄的工業和建設並未因這個制度得到理想的發展，原因是各加盟共和國在劃分經濟行政區時未盡合理；同時久處於中央集權之下的共和國、邊疆區和省，在領導權下放以後，有著嚴重的地方主義傾向。舉例來說：

一、過去由兩個經濟行政區共同管理的烏克蘭共和國頓巴斯採煤工業，過去由四個經濟行政區共管的哈薩克共和國北哈薩克斯坦石油工業，過去由韃靼、巴什基爾和古比雪夫三個國民經濟委員會管理的烏拉爾——伏爾加石油工業，現在都是集中由一個國民經濟委員會

會撤銷後，其職權由該會執行。

理的烏拉爾——伏爾加石油工業，現在都是集中由一個國民經濟委

員會管理（註二），姑不論管理現狀是否能增進工業和建設的生產，但是比較過去減少牽制，不需隨時協調，可以毋庸置疑。

二、自國民經濟委員會制實行以後，不僅各共和國之間互不通氣，而且在一個共和國之內各經濟行政區間和一個經濟行政區內的各企業與各工地之間也樹立起森嚴的壁壘，不管專業化和協作的目標是否受到破壞。以白俄羅斯拖拉機製造廠為例，雖然按照協作有二二七個企業應以產品提供該廠，但是由於列寧格勒橡膠技術製品廠有若干次不能及時提供一些小零件，以致傳送帶被迫停止工作；再以下塔吉爾冶金聯合企業為例，該廠去年為羅斯托夫五金總供銷處計劃以外的定貨運出三萬二千噸鋼鐵，而在該廠計劃內應該交運的鋼鐵却未運出，以致造成許多企業工作上的困擾（註三）。

由於以上兩大主要的及其他類似的因素，去年蘇俄全國有二〇%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未完成提高勞動生產率任務，有二三%的國民經濟委員會未完成降低成本的任務（註四）。所以然者，是因國民經濟委員會祇看到本身的利益和本身的困難所導致的。因為沒有採取措施消滅生產故障，以致不能完成工作定額的工人人數不斷在增長，以去年為例，採煤工業中不能完成工作定額的工人佔三五%，石油開採——二〇%，縫紉業——一六%，紡織業——一三%，機器製造業——七%，建築業——一一%（註五）。未採取措施杜絕盲目的增添建設項目，不能集中使用建設資金，以致住宅和兒童機關的建設計劃一貫的不能完成——最近三年，俄羅斯共和國的勞動者應得到而未得到的住宅面積達五八〇萬平方公尺，烏克蘭——七二萬平方公尺，哈薩克——三二萬平方公尺，阿塞爾拜疆——一六萬平方公尺（註六）；在此期間未完成的兒童機關，占美洛夫省——七〇〇〇個席位，古比雪夫省——三、〇〇〇個席位，突里斯克省——二、〇〇〇個席位，庫爾斯克省——一、五〇〇個席位，阿爾泰邊疆區——二、三〇〇〇個席位（註七）。由於住宅和兒童機關的建設不能照計劃完成，以致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尤以哈薩克、喬治亞、吉爾吉斯等共和國及俄羅斯共和國許多省為最，以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為例，該邊疆區去年有八萬工人離開企業和工地（註八）。

代表民主集中制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雖然直到目前

為止，黑魯曉夫並未明明白白承認它的失敗，但是在過去五年中却逐步的在採取開倒車的措施。

一九六一年五月，在經濟行政區的基礎上，在進一步加強工業和建設管理的理由下，恢復大經濟區制，將全國劃分為一七個大經濟區，每一大經濟區設一協調計劃委員會，負責協調並計劃本區以內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工作（註九），就是黑魔把工業和建設管理權重行收回的第一步。

不過，大經濟區的措施，祇能算黑魔收回工業和建設領導權的一種試探，並不表示黑魔對於大經濟區有所偏愛，他沒有付給大經濟區具體的領導權力，就是不重視的證明。恢復以後的大經濟區，既因缺乏指揮監督權，無補於蘇俄國民經濟每況愈下的危機，於是就為黑魔收回工業和建設領導權的第二步創造了條件，他乘去年十一月俄共中央全會的機會，提出「關於發展蘇俄經濟及改組黨對經濟的領導案」（註一〇），這是俄共近年來對工業和建設領導的第二次大規模改革，也是黑魔把自己建立起來的以民主集中制的基礎的經濟領導制度，用自己的手加以破壞，再回到以中央集權制為基礎的經濟管理形式。

肆 象徵經濟領導權重行收回的一個重要

機構——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

爲加強對國民經濟的領導，在俄共各級黨務組織按「生產原則」改組的同時，蘇俄部長會議表面上為配合新的需要，實質上是爲了把業已下放五年的工業和建設領導權重行收回，新設或改組了下列一些機構：

一、在蘇俄部長會議之下新設一個「最高國民經濟會議」，負責領導工業和建設的發展，協調國家計劃委員會，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蘇俄國家建設委員會及各工業部門委員會的工作，也就是新設了一個全國範圍的極為嚴整由上而下的計劃和管理國民經濟的體制。

一、在蘇俄部長會議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之下，配屬下列三個機構：

(一)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領導全國各經濟行政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執行國民經濟計劃，實現工業各部門的計劃任務。)

(二)蘇俄國家建設委員會(領導全國建設機構，實現經濟各部門基本建設任務。)

(三)蘇俄國家計劃委員會(兼負國民經濟遠景計劃及年度計劃之責)。

(根據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本年三月十三日的命令，這三個原為全聯盟機關的委員會已改為聯盟兼共和國機關，而且由二級機構降為三級機構。)

在上述新設及改組的機構中，象徵着經濟領導權重行收回的一個重要機構，是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它現在雖然是蘇俄部長會議最高國民經濟會議所屬的一個聯盟兼共和國機關，但是它有權通過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各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委員會和各經濟行政區的國民經濟委員會處理具體的業務，并且不用經過開會的程序，迅速而實際的解決大多數的問題。

今天的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不同於一九五七年被撤銷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它除設有各國工業部門的管理局、農業處、運輸管理局和其他局處外，還有幾個總管理局，主管幾個共和國之間提供金屬產品、機器製造和電工技術產品、石油產品和煤炭、化學和橡膠技術產品、木材和建築材料、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原料，以及幾個主管許多工業部門重要工地補充設備的總管理局(註十一)。所有這些局、處和總管理局，過去分屬各工業部和建設部，現在集中屬於它這種情況，是過去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所望塵莫及的。

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無疑的是黑魯曉夫的新寵兒，它的重要職責，就目前說來，有下列四大項：

一、執行俄共中央的決議和黑魯曉夫的指示，加速發展化學工業，保證達成生產高效能材料的任務，同時為了在一九六五年生產三、五〇〇萬噸以下的礦肥，及時的為配置工藝設備的定貨準備條件。

二、執行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的決議和黑魯曉夫的指示，會同

各工業部門的國家委員會、各加盟共和國機關和國民經濟委員會保證擴展生產專業化，該委員會與國家機器製造與自動化委員會就機器製造業的年需要量制定的生產九、〇〇〇萬個齒輪的計劃，當屬這一任務的第一步。

三、負責實現為農業方面提供拖拉機、汽車、機器、畜牧業機械化技術、礦肥、農藥、汽車輪胎、汽油、建設用的及其他材料。

四、會同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共和國之間和各共和國經濟委員會，部和主管機關，對各項經濟建設完成供應材料技術的計劃。我們知道，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是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以後的產物，它全部的存在時間不過才五個月，在這五個月中間一再變更它的隸屬，它至今尚未穩定下來，尚未展開工作，都是可想而知的。

伍 列寧的一句預言——『用增設委員會

的辦法來同經濟破壞現象作鬥爭』

目前俄共中央以至黑魯曉夫本人所急的，是所謂「共產主義建設時期的物質技術基礎」，建立這個基礎需要有高效能現代化的工業、建設、交通及保證軍餉民食和工業原料無缺的農業。促進這些條件的任務，雖然另有國家建設委員會和主管農業的機構，但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不但是直接主管工業的機構，也是間接要對建設和農業負責的機構，所以它的使命重於其他任何一個機構。

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要完成它的使命，也就是說，在重振中央集權的威信和杜絕地方主義拾頭的條件下，使工業、建設、交通、農業照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使建立物質技術基礎的目標日益縮短距離，它就必須具備一些起碼的條件，這就是：

一、同各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委員會及各省工業黨部密切聯繫，深入的研究經濟，在生活中去探討並且去了解工業的業務狀況，積極為實現俄共的決定而鬥爭，找出障礙計劃完成的一些因素，並採取措施予以消滅。

二、集中精力保證計劃的實現，以期物質的、勞力的、財政的

資源和天然富源得到更合理與更有效的運用，消滅生產費用額外的支出和其他損失。

三、在經濟建設中要根據縝密的經濟核算與研究，考慮每一步驟。

四、爲工業中最進步的一些部門成功的工作而創設條件，以期增進對國民經濟最有利、最經濟、最需要的各種形式的產品生產，改進生產組織，擴展專業化與協作，更迅速的採用最有效的工藝規程與工作方法、科學成就、技術與先進經驗，爲發展各部門最有利的方向方面開闢途徑，更好的使用設備，從一個生產力的單位上獲致最大限度的產品。

五、竭盡所能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改進品質、降低生產成本，增加各企業的利益。

但是，上述這五個起碼條件，不是目前才發生的，也不是今後才迫切需要的，而是從俄共開始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經濟」之時起就存在的。這些條件，既在一九五七年以前實行中央集體制的經濟管理制度時未能具備，又在一九五七——一九六二年實行領導工業和建設大權下放期間落了空，要想藉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這個新花樣來實現，我們認爲戛戛乎其難！

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卅一日的「真理報」上以「用增設委員會的辦法來同經濟破壞現象作鬥爭」爲題，發表一篇攻擊科倫斯基政府的短文說：「五月十七日的『消息報』刊載了它的經濟部關於同經濟破壞現象作鬥爭的極枯燥、極愚蠢的冗長決議」，「經濟部要改組爲國民經濟部」、「政府將增設委員會……」。列寧的新政作了預言，又似乎他在指桑罵槐攻擊黑魯曉夫政府。

今天的黑魯曉夫政府就是在玩着「增設委員會的辦法」來掩飾經濟政策失敗的把戲。在去年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以後，爲了實現收回經濟領導權的決策，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先於十二月十三日公佈蘇俄憲法第七十、第七十七、第七十八等條的修正案，依照此項修正，蘇俄政府的組織比一九六二年四月蘇俄第六屆最高蘇維埃通過的政府組織，多了六個委員會，這就是：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

到目前爲止，凡是一九五七年被黑魯曉夫深惡痛絕的，集中於中央的經濟領導形式和龐大臃腫的經濟管理機構，又成爲他現階段領導經濟的新形式，而且每一項改革和變動都引有列寧的遺言作爲根據。所差的是，當他爲他的改革措施在列寧全集裏找根據時，從未翻到列寧在四十五年以前預先留下的攻擊他玩弄「增設委員會」花樣的文章，如同根本沒有那篇文章一樣。

註（一）：最初全國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共劃一〇五個經濟行政區。

註（二）（三）（四）（十一）：見一九六三年四月六日「真理報」所載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狄姆希茲論文——「實現計劃是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要任務」。

註（五）（六）（七）（八）：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廿五日「真理報」所載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格里申在該會第十一

次全體大會上的報告。

註（九）：詳見本刊第一卷第七期五一九頁「蘇俄重建大經濟區制的背景與前瞻」。

註（十）：詳見本刊第二卷第四期二二四頁「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